

如何擾動派系政治？都市社區派系與「絆」的建立

臺中市中區柳川地區個案研究

高紹誠*

摘要

臺灣地方派系研究皆認為臺灣地方派系正逐漸瓦解，其中都市化越高地區，派系政治顯得更加鬆動。然本文在台中市中區柳川地區發現，張派網絡潛遁於社區以及傳統宮廟中，並透過「香油錢關係」存活在都市社區當中。

臺中市中區為臺中市最早都市規劃地區，然在 1980 年代後出現商業衰敗和總人口數下降狀況。本文於 2017 年至 2018 年於臺中市中區柳川地區進行兩年田野研究，透過民族誌和深度訪談 9 個社區組織，發現商業與人口數逐漸衰敗的中區仍保有傳統宮廟和小店家，環境上適合派系政治發展。中區派系網絡透過宗教組織潛藏於社區，宗教「積功德」等倫理價值強化並模糊侍從關係。本文以「香油錢關係」稱此侍從關係，並認為香油錢關係僅模糊主從間權力矛盾，並未解決社群差異間衝突。

Putnam 認為「水平」且「密集」的市民組織為市民社會的條件，然如何在具有衝突性的社區派系中建立市民社會？本文案例中新社群抓住舊社群認知的「老故事」和「老人長照」作為社區營造主題，並陪伴舊社群共同實作，新舊社群在社區營造過程中建立「濃厚友誼」。本文借用日文漢字「絆」說明新舊社群緊密、多元且水平的關係，並認為社區中的「絆」擾動派系政治，造就市民社會的關鍵。

關鍵字：都市社區、派系政治、香油錢關係、絆

* 本文作者為東吳大學政治研究所碩士生

Faction politics and Kizuna in urban community-Case study of LiuChuan Area in Taichung City Central District

Shao-Cheng Kao[†]

Abstract

The research of Taiwan's local politics has regarded decaying faction politics in Taiwan, particularly urban area. However this article finds faction network of Zhang is hiding in taoism temple in LiuChuan area of Taichung City Central District. "Oil money tie" promote faction politics development.

Taichung City Central District is earliest development area in Taichung City. However the commerce and population have been declining from 1980s in Taichung City Central District. This article has interviewed nine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and field work during June 2017 to November 2018 in LiuChuan area of Taichung City Central District. This article finds the taoism and traditional shop is still working and promoting faction politics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culture of taoism, the faction hides and evolves in community. The taoism culture of "Doing a Good Deed" bonds and obscures patron-client relations. This article names this tie "Oil money tie" and regards Oil money tie only obscures contradiction of political power, not conflict of heterogeneity.

Putnam accounts political equality, trust and association compose civil society: nevertheless, how to constitute civil society in faction. New community utilized old story and elderly to do community work. Also, new community accompanied local resident to do community work and set up strong friendship. This article names this tie "Kizuna" from kanji. Kizuna brings social capital and transforms faction politics to civil society

Key word : urban community 、 faction politics 、 Oil money tie 、 Kizuna

[†] Author is master's degree stud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of Soochow university.

壹、研究背景與動機：

1990 年代臺中市人口開始從市中心外移，中區也漸漸走向沒落，主要以商圈和小店家的中區，也因為屯區發展商業逐漸沒落(蘇庭玉，2014)，「中區衰退」一詞在 1999 年正式被臺中市政府提出[‡]。2012 年由東海大學建築研究中心承接計畫，成立中區再生基地。2014 年臺中市政府提出「臺中市城中城再生執行方案」，推廣主軸放在中區的歷史文化，並且輔導藝術家和青年進駐中區創業，藉由文化促進經濟發展吸引更多團體進駐中區。

2015 年臺中市參與式預算舉辦餘中區，研究者擔任主持人工作發現現場出現鄰里志工隊動員進行投票，最引人注目的是柳川里環保志工動員，當時動員人數遠超過其他團體。中區衰退的論述以「人口與經濟成長指數下降」為主，但本文卻在柳川里中看到派系網絡動員蓬勃運作。然而臺灣地方派系在 2000 年後正逐漸式微(王金壽，2004)，甚至在都市地區派系網絡因為人口結構快速變動，選舉動員網絡政變的鬆散(高永光，2001)，為什麼原市籍「張派」派系網絡仍可在中區發展？

近四年發展上 2015 年林佳龍成為臺中市新市長後，臺中市區柳川地區同時存在著過去以宗教和鄰里關係所建立的「舊」社群，以及 2015 年中區再生政策資源帶入的「新」社群。兩個不同社會背景所建立的新與舊社群在 2017 與 2018 年相互接觸，此時中區再生政策並非展現預期的經濟與人口的增長，而是非預期促使不同人際網絡所組成的政治關係進行合作。

臺灣派系政治在 2000 年後逐漸式微，但派系網絡卻在都市社區的「臺中市區柳川的區」蓬勃發展。然而看似衝突且排外的派系政治，卻願意與新社群合作。本文要問由人情關係所建立的「舊」社群真的因都市化而衰敗嗎？又 2015 年後所展現的「新與舊融合真的能「擾動」舊有派系政治？

[‡] 〈為提振中區商機問卷調查已回收分析完成〉。1999。《臺中市政府全球資訊網》。
<https://www.epb.taichung.gov.tw/8868/8872/922086/post>。1999/04/22。

貳、研究發問與目的：

本文試圖透過社會網絡理論說明關係 (Kan-ching) 網絡如何運作，以及思考關係網絡如何助於臺中市市政發展。是故本文以「舊政治」來說明以宗教與人情所建立的運作機制，「新政治」說明 2015 年因為政策與政治結構改變，進入中區的人際網絡與資源：

一、柳川里關係網絡因為都市發展而消逝？

「關係」是由自己為中心向為延伸的「差序格局」(費孝通，1948)，台灣地方派系研究上則認為「關係 (Kan-ching)」是由血緣、地緣、同事、同學、結拜等為基礎的人際關係，為地方派系發展的基礎 (陳明通，1995)。關係受到都市化造成人口結構改變，使得舊有且緊密的人際關係受到破壞，地方派系逐漸式微 (曾國鈞，2001)。但本文在柳川里看到都市地區有著由「關係」所組成的鄰里組織與宮廟網絡，此時本文開始質疑都市化是否造成「關係」的瓦解？而柳川里的關係網絡如何運作與維持？

二、「新」與「舊」政治合作下市民社會如何浮現？

台灣過去市民社會研究中，丁仁傑(1999;2007)以及吳介民與李丁讚(2005)以個人動機作為市民社會的判準，認為台灣社區發展協會與宗教組織的社區服務是以個人利益為出發，而非組織所有成員利益。何明修(2007)則認為台灣民眾欠缺公民美德，社區組織排擠外來團體，阻礙市民社會發展。但本文卻在柳川里看到「新」與「舊」政治在不同利益基準上進行合作，並且產生互惠關係。此時本文認為以「個人動機」並非作為市民社會的唯一判準，在柳川里中市民社會 如何建立在不同利益當中？

本文討論「都市衰退」以及「市民社會」主要目的並非再於批判兩種理論論述，而是藉由社會網絡分析，與兩種論述作對話，最後批判當前臺中市區衰退論述，以及省思 2015 年以後「中區再生」政策，是故本文研究目的如下：

一、回應臺中市區衰敗主要論述：

目前臺中市政府對於中區衰敗論述建立在經濟與人口外移(臺中市區公所, 2018), 然而在柳川里個案中本文發現數據無法顯示的「社會資本蓬勃」, 「人」的活躍長期被遺忘在都市規劃者甚至居民的生活當中。是故本文以蓬勃人際關係互動為研究主軸, 回應經濟取向的中區衰敗論述。

二、市民社會在柳川里發展意義：

過去文獻中提到, 傳統宮廟、鄰里組織和社區發展協會壟斷設區公共事務參與, 這些由血緣、地緣等關係所組成的組織被形容排外且無助於市民發展, 然而柳川里卻出現「新」社群與由關係所建立的「舊」社群進行合作與產生互惠。本文認為過去研究並未真正對關係有所認識, 而柳川里個案新舊社群合作為過去研究中相反例子, 說明市民社會仍可以在傳統社區組織中發展, 提供柳川模式下的市民社會發展意義。

參、文獻回顧：

本文主要描述與分析臺中是中區柳川的區派系網絡在都市社區發展, 以及派系政治如何在新舊社群合作下開始轉變為市民社會, 是故本文研究核心在於「人」帶來的「網絡」如何改變派系政治, 進而創造市民社會。本文以社會網絡理論出發, 並與臺灣經驗研究作對話：

一、社會網絡與關係 (Kan-ching)：

社會網絡經驗研究為 Barnes (1954) 在挪威 Bernme 小島研究, 他以民族誌方式記錄到 Bernme 有一種不受地域疆界以及組織形式控制, 並且進行連結的社會關係。這關係如同「網絡」般連結 Bernme 每個家族, 甚至海外家族成員, 且形成「委員會」政治組織, 甚至影響在公共域上階級制度。另外在 1950 年代結構功能論興盛時期, Bott (1957) 將夫妻關係以「網絡」方式進行分析, 解釋過去結構功能論無法解釋「分離的夫妻關係如何維持」。Bott 發現到隔離夫妻關係看似分離, 但夫妻間可透過自身網絡連結至彼此, 這種關係並非孤立, 而是處於高度個人化的環境所產生 (Bott, 1957: 383)。

Bott (1957) 認為 網絡是家庭互動間產生的結果，社會網絡是置於家庭與社會環境間。Granovetter (1973) 也將社會網絡視為連結微觀與巨觀之間橋樑，並且區分兩點間關係強度-強連結、弱連結。強連結中（如朋友、家人）個人關係間同質性較高，網絡中的資源也相當。然而弱連結與強連結相反，弱連結是不同網絡間重要的橋梁，個體間同質性低，可連結的資源較為豐富。Granovetter 以找工作為例，他發現到工人會透過朋友間關係找到工作機會，且該工作待遇比從報紙找到還要優渥。Bott (1957) 和 Granovetter (1973) 的發現啟發了 Burt (1992) 結構洞理論，亦即網絡中出現僅有某些個體與自己相異的個體相連，其他個體則無時，網絡中便出現「網絡結構洞」的現象。此時弱連結論證的是資訊如何跨越不同群體傳遞，Burt (1992: 28) 認為結構洞則是論證資訊如何在整體網絡跨越不同群體傳遞。當結構洞出現在整體網絡當中，此時網絡結構中的「洞」成為各群體間資訊傳送的關鍵，佔有該關鍵位置的個體便成為群體中輸送「非冗餘的信息」橋梁，同時也是網絡當中重要的「社會資本」。

綜上社會網絡是一種關係結構且連結行動者與社會，行動者鑲嵌在社會網絡，且透過社會網絡中的關係獲得資訊。社會結構影響個人見面交往的機會，而個人再透過自身的關係與位置做出行動獲取利益，進而影響社會結構，是故社會網絡是在「社會結構」與「個人」互動所形成的關係 (relation) 網絡 (Marsden, 2000)。

社會資本在社會網絡中為鑲嵌在網絡當中的「資本」，個人在經濟市場除透過經濟資本與人力資本進行投資外，同樣需要在關係當中進行投資，藉此換取經濟市場中重要資訊 (Burt, 1992: 10)。此時可以看到社會資本與社會網絡有著密不可分的关系，以下再以 Bourdieu (1984; 1986)、Putnam (1993; 1995; 2000)、Coleman (1988)、Nan Lin (1999)、Fukuyama (1995; 2001) 論述以表 3-1 整理：

表3-1：社會資本認識

姓名	什麼是社會資本	社會資本如何獲得與維持
Bourdieu	社會網絡中的集體資源	統治階級利用經濟或文化資本進行轉換，透過資本來連結、認識彼此，並進步產生認同，藉此區分不同階級。
Coleman	社會結構以及結構中行動者功能	行動者關係結構中義務、期待與社會規範。
Nan Lin	鑲嵌在網絡中的資源	社會關係投資，並且期望在市場中獲得回報。
Putnam	志願性組織規範、信任與網絡特徵	活躍的志願型團體網絡帶來互惠，進而增加地區社會資本，促進民主發展。
Fukuymam	實體化的非正式規範，社會資本確保個人間進行合作	信任、網絡、市民社會以及社會資本是不可分離的四個要素，豐富的社會資本存量來自於密集的市民社會。

資料來源：本文自行整理

從表 2-3-1 可以得知 Bourdieu 和 Coleman 將社會資本建立在規範與認同，Putnam 與 Fukuymam 與也以社會結構來說明社會資本鑲嵌在網絡當中。Putnam (1993) 更認為社會資本是一個地區的密集社區組織，組織間因為互動產生互惠關係，進而提高市民參與水準，並促進市民社會成長。然而與前述四位學者不同的是，Nan Lin 雖然也認為社會資本式鑲嵌在網絡中的資源，但他認為社會資本是一場「關係」的投資，這種類似「交換」的形式如同柳川里日常生活中所看到的關係的連結。

一、關係 (Kan-ching)：

臺中市區柳川地區日常生活中，居民透過出生地、組織名義、輩分、社會地位以及感情來決定彼此間的關係，如居民間合作會先以自己認識的組織或成員先下手，其次才會再往外延伸。此種人際關係如同費孝通 (1991) 所述的「差序格局」，將一塊石頭往水裡丟所發生的一圈圈波紋推出去，每個人都是社會影像

所推出去的圈子中心。這種人際關係同樣強調人與人之間的連結，同樣屬於社會網絡範疇，然而此種關係的建立並非透過人與人間的見面交往決定，而是牽涉到雙方「相同」與「感情」，並且左右個人的政治結盟與認同（Jacobs, 1979）。如居民在選擇政治聯盟或接受賄選選票時，他們會傾向與親戚、同學、或同鄉者結為政治盟友。因為此種人際關係無法以水平的見面交往關係（relationship）解釋，是故以音譯「Kan-ching」來概念化之。

關係（Kan-ching）與前述西方學者所提出的社會網絡理論比較，雖然關係同樣也是人與人之間連結，但關係強調的是一種「交換互惠」關係。Jacobs（1979）於研究中也提到人與人之間透過不斷的交換與互惠欠下人情，使雙方建立起親密的連結。在臺灣地方政治研究上，關係被用於地方派系研究當中。派系是一個具有「衝突」的單位，且成員間透過「交換」來建立彼此間連帶（蔡明惠，1998）。陳明通（1995）則認為關係本身便是一種「資本」可以用於累積以及投資的資源，這有效說明地方派系如何透過「人情關係」進行選舉動員。然而關係（此種社會資本與 Nan Lin 所述相同，關係是人與人之間的投資與交換。吳芳明（1996）則表示若過於重視「情感」則會忽略派系成員間垂直關係，是故關係本身便是社會資本的一種，人與人間關係的建立如 Nan Lin 所述是透過交換與投資所建立而成。

然而柳川里為都市地區，關係卻是在農村地區所發現。Jacobs（1979）研究地為嘉義新港（Matsu）鄉，在當時新港鄉為農業生產為主的鄉村地區，Jacobs 描寫到自己的田野時寫到：

新港鄉大部分的土地用於農業生產...新港鄉有 85%的土地用於生產目的，
用於生產的土地中有 90%為灌溉用地。（Jacobs, 1979: 241）

Jacobs（1979）於農村地區發現關係，但在都市地區是否會出現關係的人際網絡？若從都市人際網絡角度來看，Tönnies（2010）認為都市變遷環境中，傳統以親屬與道德的「禮俗社會」逐漸被以契約所規範的「法理社會」所取代，都市

社會逐漸轉變為冷漠生活型態。Simmel (1950) 同樣以「冷漠」來形容都市人，他認為都市由於人口密集，都市人為了習慣多樣化的文化，逐漸養成對周遭「冷漠」的態度。芝加哥社會學派 Wirth (1938) 相信都市有三種特質-大量人口、密集、以及異質性，並認為都市文化依循著這三個變項而展開。Wirth 依循 Simmel 對於都市的看法，都市人生活冷漠是因為他們在對抗個人的接觸，都市人是具有集體行動，且因為團體的不同而產生隔離。曾國鈞 (2001) 發現到都市化帶來不同外來人口，促使以傳統地緣與血緣關係所組成的地方派系動員網絡逐漸瓦解，都市化改變人口結構，同時使得地方派系逐漸式微。是故依照前述理論，關係存在於人口密度低，且國家法律不健全的地區，關係似乎早已消逝在都市當中。

然而 Castell (1977) 認為都市並不只是空間形式，都市更是集體勞動力再生產的形式。是故看待都市不能僅以「人口密度」最為考量，必須從理解空間當中的社會結構、經濟與政治出發 (Castell, 1977: 430)。Castell (1983) 發現到都市的日常生活服務逐漸被國家所取代，當都市為集體勞動力再生產的形式出現時，都市內部開始出現「集體消費」的不足，此時資本主義的矛盾仍存在於都市當中，但因為國家主宰都市日常生活的基本服務，使得勞工開始向國家提出「集體消費」的困難，而資本主義的矛盾呈現在「國家」與「市民社會」兩個角色衝突當中。

項飆 (2001) 在北京浙江村研究時發現到，傳統以血緣與地緣等關係（所建立的網絡仍然存在，商人透過此種關係確保交易安全，關係此種非正式人際關係連帶連結正式與非正式經濟體，成為國家控制之外的「地下生活」。從項飆 (2001) 的見解來看，關係進入到都市環境中並未完全消失，它反而以「非正式」的方式存在於日常生活當中，並鑲嵌在許多以契約所成立的正式組織當中。關係在都市環境中的出現在中國的其他研究中可以看到，如蔡禾、賈文娟 (2011) 在農民工研究發現到承包商會透過親戚與老鄉等初級社會關係建立起「核心工人」組織，藉此確保穩定的勞動量，而勞工透過關係確保承包商會準時發放薪水。此時關係在都市環境中似乎成為連結正式制度與非正式人際關係的橋樑。

柳川里當中存在著許多國家制度法規上的「正式」組織，然由「地緣關係」所組成的成員同時也存在於政治組織當中，但此種地緣關係由是以「行政區」此國家制度法規創造下的地區劃分。是故本文認為柳川里展現出「關係」鑲嵌於政府組織以及其他社團法人當中，這似乎與 Castell（1977）的見解，國家角色已經完全進入到都市裡所有日常生活角落，但又如項飆（2001）所述，非正式的「關係」網絡鑲嵌在正式組織當中，成功連結國家與市民社會。

項飆（2001）所敘述的浙江村是一個由商人網絡所建立而成的跨越邊界的社區，在柳川里此種以「行政區」為範疇的地區被明確的法律制度所規範，但有存在著非正式的地緣關係，柳川里內關係的組成是否如同項飆所述，關係仍存在於正式組織當中，且連結國家與市民社會？又或者與過去臺灣經驗研究所稱，都市化造成傳統由血緣、地緣關係組成的團體逐漸消逝？而在臺中市發展脈絡中「關係」以什麼樣的形式連結國家與市民社會？

二、臺灣市民社會的困境：

臺中市中區柳川地區有著宗教、鄰里、以及 2015 年後新進的藝術家組織，這些密集且多樣的組織在柳川里代表什麼？表 2-3-1 中提到 Putnam（1993）認為密集且多元的志願性組織帶來是會資本存量，甚至 Putnam（1995）更將此做為美國研究的依據，認為市民參與以及志願性組織有助於散播公民美德，促進市民社會發展。

（一）西方市民社會概念：

市民社會在西方脈絡上最早為 Aristotle（1981）政治共同體（*koinonia politike*），所有人依照其興趣與專長在城邦中建立共同體，然而在當時背景下卻有著階級與性別上的差異。18 世紀後因為商業開始興起，個人逐漸從社會共同體脫離，個人權利開始受到重視。當時由 Adam Ferguson（1793）、Adam Smith（2002）等蘇格蘭啟蒙哲學家開始討論資本社會後，如何在個人追求私利同時兼具古典的公民美德。19 世紀後國家與市民社會逐漸二分，如黑格爾認為市民社會市落實「個人主體追求利益滿足之個別性權利」（蔡英文，1999：93），國家的任務在於維持群體

秩序，並承認個人主體的法律地位，與黑格爾個人主義相對的是 Tocqueville 社群主義。Tocqueville（2000）因為研究監獄制度來到美國，他發現美國不僅有工商團體，甚至有宗教、道德等廣泛社會組織。市民結社文化提供有效且穩定民主政府，個人在社團當中進行公共領域參與，培養團結與合作的公民美德，甚至跨越在不同的組織當中，使得組織間進行互動，進而對國家產生監督效果。

Tocqueville（2000）指出美國人「平等」來自於積極參與社團組織，個人微弱的力量無法在對社會產生影響，而眾人所聚集的政治團體，社團成員可在內部共同討論社團利益，從中放棄私人利益來成全眾人意見。是故 Tocqueville 認為國家的民主發展來自於眾人利益，個人主義會導致公眾對政治冷漠。而美國社會便是在結社中學習與他人互動，進而放下私利成就眾人利益。Tocqueville 對市民社會討論提仍在「私利滿足」與「公民美德」中尋找平衡。20 世紀後 Putnam（1993）援引 Tocqueville 結社與公民美德，但 Putnam 導入社會參與和公共領域等 20 世紀後半出現的議題，此時的「公民美德」並非指清教徒式道德情操，而是指能包容多元文化價值，並對公共事務具有熱情地精神，因而 Putnam 被喻為 Neo-Tocquevillien 學者（Mbaye, 2007）。

（二）臺灣市民社會結社困境：

Neo-Tocquevillien 學派將密集的市民組織網絡視為市民社會象徵，CIVICUS 在 2005 年對臺灣社會進行調查發現到臺灣擁有大量的市民團體，然而團體彼此間互動機會少，且在公共事務參與度低落（Teh-chang Lin, 2005），這現象完全與 Neo-Tocquevillien 學派所期待「多元且密集的社會組織帶來互惠」不盡相同。

臺灣經驗研究上，吳介民、李丁讚（2005）認為臺灣社會中固有的生活習慣、以及人情糾葛導致現代性的市民社會遲遲未能誕生，使得派系的「私政治」成為最主要的運作模式。何明修（2007）更指出 Neo-Tocquevillien 學派對於結社想像過於浪漫，臺灣因為過去威權政府留下的文化，使得普遍民眾公共參與能力低落，即使結社也難以散播公民美德。而在近年來經驗研究中，林聖佑和陳東升（2018）在社區中參與式預算發現到，社區營造經驗「弱」的社區比起「強」的社區更容

易建立社區民主發展，影響民主發展的反而是社區中「組織文化」，而非社區組織活躍度。

上述學者認為臺灣社會中根深蒂固的傳統文化，以及威權政治阻礙臺灣市民社會發展，熊瑞梅（2014）更指出宮廟以及社區發展協會網絡成為地方派系的觸手，排擠社區營造團體進入社區的機會。丁仁傑（1999）認為華人文化「助人行為」建構在「個人動機」，他以慈濟功德會為例子，慈濟成員參與動機上是為了個人修生養性、提升福報的個人利益。而慈濟功德會以工具性的身體實作方式散播自身教義，要求社員不得接觸政治。慈濟功德會非以論述性的討論公共政策、提升個人公民意識或促進個人權利保障，並非臺灣市民社會象徵（丁仁傑，2007）。

前述以「個人動機」所建立的交換互惠正說明由「關係」組成的「組織文化」，如同 Jacobs（1979）所述要理解派系文化不能完全以「情感」變項加以解釋，更應該從「交換互惠」的態度去理解關係（Kan-ching）如何在派系網絡運作。然而宮廟和社區發展協會真的阻礙市民社會發展，成為傳統人情或利益交換的「私政治」再生產？王文誠（2011）認為臺灣在社會運動後有許多組織者重回社區，這些具有反身性角色形成市民與政治菁英間的「中介團隊」，促使社區多元化發展。楊弘任（2014）對提出「文化轉譯」的概念，他在林邊鄉進行研究時發現到林邊鄉同樣存在著居民不理解論述優先的市民社會運作方式，然而林邊鄉社會運動者、文史工作者、派系領導、慈濟功德會成員以及居民則透過「身體實作」相互理解彼此文化與習慣。

「關係」雖具有交換特性，然而交換依照 Nan Lin（1999）的見解本為社會資本流通形式，Tocqueville（2000）更認為民主是立基在「個人利益」之上（Jaume, 2017）。派系成員間有「非對稱」的「依賴關係」關係，早先人類學家以「恩庇侍從主義」稱之（Firth, 1957: 293），陳明通（1995）則更進一步以「二元聯盟」稱之，分類為垂直二元聯盟和水平二元聯盟。在垂直二元聯盟中，侍從者依賴恩庇者輸入利益，恩庇者則需要侍從者提供權力正當性。派系組織形式中分為派系領袖以及核心幹部，若派系領袖不存在時，核心幹部與領袖間垂直關係便不存在，

若核心幹部想讓整個派系繼續存活，便需要另推或臣服新的領袖之下（陳明通，1995：16）。是故派系在「組織形式」上的垂直二元聯盟，以及「參與形式」上恩庇侍從關係才是阻礙市民社會主要原因。

本文認為市民社會並非僅從個人動機觀察，與個人行為的改變如「結盟形式」以及「參與形式」也是市民社會的觀察重點。市民社會建構在社會當中的信任與互惠當中，這種合作為水平且密集，最後形成由下而上的「市政精神」（Jaume, 2017）。如 Tocqueville（2000）見解，個人為達成自身目的與他人進行結盟，從中學習放下個人利益來迎合公共決定，並且從合作中與他人發生互惠的「信任」關係，促使「民主」成為日常生活文化（Jaume, 2017）。Putnam（1993;1995;2000）則更進一步認為除了多元且密集社區網絡以外，市民參與是促進市民社會發展關鍵。是故在 Tocqueville 和 Putnam 這組「社會資本」的市民社會形式，「多元且密集的社區網絡」以及「市民參與」成為社會資本式市民社會最主要的判準：

1. 市民參與：

個人在志願性組織中培養公共事務討論習慣，並且學習放下私利促成公共利益。市民參與在志願性組織中會學習公民美德，包容多元價值觀。市民在志願性組織中相互幫助，進一步培養個人間信任關係。市民社群所產生的關係是「水平」連結，如同義大利的鞋匠公會，所有成員在政治權力上都是平等互惠，而非垂直的威權或依賴關係。市民社會中不應該存在威權或是依賴單一人權力結構。

2. 多元且密集的社區網絡：

當個人在團體中進一步與彼此產生信任，培養結社習慣時，團隊成員會有部分成員參與多個社團組織。前述特質創造出市民社會結社對內影響成員，對外影響整個政治體制。初始成員間停留在組內間合作習慣，以及培養團結與公共領域參與。而後個人會開始跨越不同團體，此時他們的態度會朝向溫和且包容各種不同異質團體，進而提供有效且穩定的民主政府（Putnam, 1993: 91）

臺灣社會中存在著以關係組成的「私政治」，但社區內已經開始存在著其他反身性團體，他們試圖組入社區、認識社區並且轉化社區內的「私政治」（王文

誠，2011)。柳川里同樣存在著以傳統「關係」所組成的社區組織，然而這些組織卻在 2018 年與區公所、藝術家和社區營造組織進行合作。這似乎反駁「個人動機論」認為的傳統社區組織阻礙市民社會發展，「社會資本論」亦即個人動機並非市民社會重點，市民社會重點在於社區組織如何建立多元且密集的市民參與網絡，此時柳川里當中新與舊團體如何進行合作？成為本文的研究重點。

肆、研究範圍與方法：

本文研究尺度為社區與鄰里關係，且涉及「新舊社群」交融動態改變，其研究方法採以質性研究。資料取得方式主要以深度訪談和民族誌為主，研究者於 2017 年 6 月至 2018 年 11 月 1 年又 6 個月時間進入柳川里環保志工隊，再加以擴大其他社區組織，針對臺中市區柳川地區「日常生活」進行資料蒐集。最後本文透過「扎根理論」方式，從田野日誌和訪談資料從中歸納出政治運作軌跡：

一、個案特殊性：

本文所謂「舊社群」是以由血緣、地緣、宗教、同學、同事等以情感和相同背景所連結的政治關係；「新社群」為國家政策或制度下所帶來的人際關係網絡或資源。本文選擇「臺中市區柳川里」為個案主要有以下幾點原因：

（一）大誠社區組織型態上的特殊性：

位於臺中市柳川地區之大誠社區發展協會，該協會係由中華里、大誠里、大墩里和柳川里所組成，該型態並不屬於蔡育軒、陳怡君、王業立（2007）所分類之兩造合一型、合作互助型、互不干擾型、以及衝突對抗型四種分類。此種「聯合型社區發展協會」是透過宮廟網絡與「結拜」擬制血親網絡所組成，社區發展協會本身座落「輔順將軍廟」地下室，宮廟主委本身為協會創始人且至今仍為「張派」派系成員。是故本文認為要探討都市社區中派系網絡如何在「非正式」關係網絡建立，組織型態上大誠社區及其會員如何維持及利用自身網絡中的資源則是本文需要聚焦之重點。

（二） 區域上發展特殊：

本文第二個問題聚焦於「柳川里市民社會型態」，在「個人意識」以及「社會資本」兩大觀點進行討論。臺中市市區因為有著人口與經濟成長指數下降的歷史，使得 2015 年後成為新市長重點發展地區。「文化城中城」政策中，市政府原希望帶動文化創意產業發展中區經濟，然而該政策卻帶來藝術家、議題團體以及社區發展組織。最後在 2017 和 2018 年與柳川里既有的社區組織合作，進行社區營造。柳川里因為政策帶入新的人際網絡以及資源，使得由宗教及血緣「關係」組成的組織與「新」組織進行合作，此現象與剛好符合本文主要的研究核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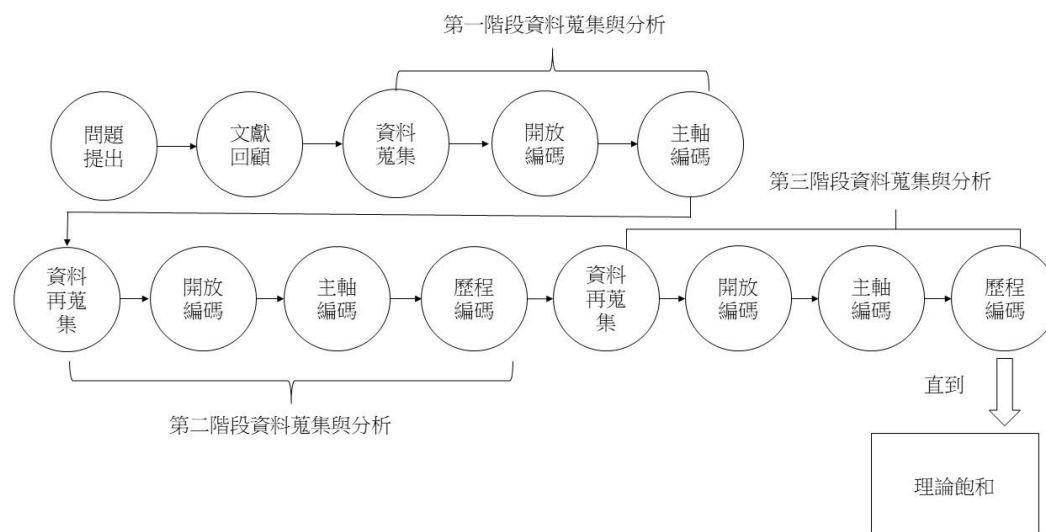
二、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聚焦「如何使用關係」的個人行為上，在資料蒐集策略是從田野中的「行為」，並配合「次級資料」如政府資料、地方誌與政策資料進行歸納，並建立概念與理論對話。基於上述本文質性研究派點上採取「扎根理論（grounded theory）」途徑，以下說明扎根理論以及本文資料蒐集與分析。

（一） 扎根理論：

扎根理論是「有系統的蒐集和分析資料，並從資料所衍伸而來的理論」（Strauss & Corbin, 2001），凡具微觀、以行動為導向、以及有時間發展歷程的社會現象，皆適合透過扎根理論做研究（紐文英，2018：452）。本文研究問題上涉及到「社會如何影響個人行為」，而「個人行為如何反應社會」，研究尺度定位上在「中間及微觀」之間，具有行動導性以及時間發展性質，是故在質性研究派典上採取「扎根理論」。扎根理論受到「符號互動論」影響，該理論強調理論僅是暫時，研究者必須在資料與理論中來回挑戰，直至「理論飽和」為止（紐文英，2018：457）。「系統化」為扎根理論重要程序，該程序是透過資料的蒐集、分析、比較；再蒐集、再分析、再比較的循環過程，不斷以歸納方式進行分析，以建立反映社會現象的理論（紐文英，2018：452）。本文以圖 4-1 表示資料分析流程：

圖 4-1：本文資料蒐集與分析歷程圖



資料來源：本文自行繪製

(二) 資料蒐集方法：

參與式觀察和訪談為本文主要資料蒐集來源，研究者於 2017 年 6 月因為參與式預算研究，由推廣環境教育之呂老師協助進入柳川里環保組織，協助里長申請政府計畫經費。因為進場時研究者已被定位為「行動者」，是故研究者在田野期間干預度極高，甚至在 2018 年臺中市社區營造點上，研究者試圖透過社區營造動柳川里政治生態。研究者於田野中主要以事後「田野日誌」書寫記錄參與過程，主要依靠研究者本身紀錄資料，其次以照相方式記錄圖像資料。若田野中有事先詢問報導人意願，研究者也會透過錄音方式記錄現場聲音資料。

訪談則分為「現場隨機訪談」和「深度訪談」，現場隨機訪談為研究者在田野現場隨機訪問報導者，因為田野當中報導者在遭遇特殊事件後，會以自然且直接的心態描述自身心情，是故隨機訪談在時間點上比事後深度訪談資料可性度較高。然因為研究倫理考量，研究者主要以紙筆紀錄，若有經過報導人同意則以錄音紀錄，本文會以「柳川日誌」為夾駐說明此資料出處。又深度訪談主要蒐集事件前後報導者主觀心態改變，以及研究者無法參與的資料。在本文會以「受訪者 XXX」來表示該資料為深度訪談。本文以臺中市「文化城中城」政策為新舊社群

之界線，將所接觸之舊社群和新社群以表 4-2 表示：

表 4-2：本文所接觸之新社群和舊社群組織名單

新社群（2015 年後成立組織）	舊社群（2015 年前成立之組織）
熱吵民主協會	大誠社區發展協會
愛社享生活文化有限公司	柳川里環保志工隊（由里鄰長組成）
社會實踐暨城市創生中心	聖心修女會
柳美術館	臺中市區樂齡中心

資料來源：本文自行整理

伍、中區經濟衰退與香油錢關係：

本文所述之臺中市區（下稱中區）在發展歷程上經歷過商業興起與衰敗，中區於清領時期被稱為「東大墩街」，日治時期後才出現「臺中」一詞（黃秀政，2008），「東大墩」便出為中區的舊地名（臺中市區公所，2018）。日治時期後中部地區第一個現代都市規劃地區便位於中區，往後成為早期臺中商業、行政與交通的都市中心，是故臺中市區被論述為臺中市最早發展地區。國民政府來台後，中區經濟繁榮從 1950 年至 1986 年，中區曾出現帶狀商業圈、綜合商業大樓，到 1970 年代末期出現如財神百貨、遠東百貨、千越大樓等 11 家百貨公司。2008 年臺中市政府出版的〈臺中市志-沿革志〉記載到「1951 年中區仍為人口比率最高地區占 16.1%，其次為北區，而後為東區，然人口逐漸向西區移動」，然到 1973 年後人口比率最高地區為北區與北屯區，1974-1989 年人口開始集中在北屯區與西屯區，1996 年後屯區人口正式超越市中心。

一、中區經濟衰退與救中區計畫：

臺中市區衰退論述，在臺中市政府論述中，從 2008 年黃秀政編撰地方志《臺中市志》將中區衰退原因歸咎在重劃區造成的產業外移。地方志認為臺中市在 80~90 年代發展開始偏向西屯地區，重劃區中新興商業區設置使得中區經濟逐漸外移到西屯區等新開發都會區，最後造成臺中市區市中心衰退。另外舊有市

中心如土地產權過於分散使得都市開發難以在臺中市區進行，最後移轉至新興重劃區，人口與經濟從中區外移到西屯區等重劃區（施怡真，2002）。

前臺中市區產業衰退現象，有認為交通也引起臺中市中心衰退現象，如道路幅寬過窄、路口間距太小、以及停車位過少，無法符合汽車普及後的臺灣社會（黃琬琇，2013）。另有認為是產業型態轉變以及交通的轉變使得臺中市區經濟逐漸衰退，如大買場出現使得中區雜貨店批發生意下降，或是道路過於狹窄無法負荷汽車車流量（向雯涵，2009）。

臺中市區都市衰退論述，市中心人口移出和建物老舊（鄭吉成，2001），以及公共安全事件造成的都市傳說，如 1995 年因為消防設備不足，造成台中衛爾康餐廳大火燒死 64 人，使得社會中流傳臺中市區「幽靈船」傳說，幽靈船必須湊滿百命才會啟航（張展誌、朱淑君、林柏燕，2017）。綜合前述臺中市區都市衰退因素，本文歸納過去到現在臺中市區衰退論點：

- （一） 道路過於狹小，且停車位不足無法滿足汽車運輸需求。
- （二） 臺中市區土地權過於分散，難以進行都市更新；而 80~90 年代新興重劃區吸引商業與住宅區開發，造成人口與產業從市中心向外移。
- （三） 老舊建物造成公共安全事件，有傷亡事件地區產生都市傳說。

表 5-1：1986 年至 1995 年（民國 75 年至 84 年）十年間臺中市區人口變化

西元	總人口數	年增加率	西元	總人口數	年增加率
1986 年	43656	0.2	1991 年	34447	-36.4
1987 年	41381	-55	1992 年	33564	-26.3
1988 年	38270	-81.3	1993 年	33291	-8.2
1989 年	37177	-29.4	1994 年	31772	-47.8
1990 年	35702	-41.3	1995 年	28282	-123.4

資料來源：黃秀政。2008。《臺中市志-沿革志》。臺中市：臺中市政府: 182-183

此時中區總人口數 1986 年開始下降，如表 5-1 顯示中區人口數於 1986 年達最高 4 萬 3 千人後開始逐步下降。1999 年張溫鷹市長期間，臺中市政府以民調方式對中區平等街、繼光商圈、和市府路進行調查中區商業衰退問題[§]。

2007 年胡志強為市長時期提出「百億救中區」方案認為「作為全市心臟的中區行政區不可輕言廢棄」^{**}。同年度第二市場進行改建，設計以「客家圓樓」作為藍圖^{††}。並於 2007 年發布「臺中市舊市區都市更新地區劃定案」，將都市計畫列為振興中區經濟的主要方針。同年胡志強再提出「百億元救中區計畫」包含以下三點：包含以下三點^{‡‡}：

- (一) 強化商業特色，並結合週邊地區發展經營為多元化都市空間。
- (二) 吸引臺中市鄰近區域之創業產業，提昇中區商業競爭能力促進中區繁榮發展。
- (三) 完成中區人行休憩徒步區空間交通規劃，建構具有歷史文化、教育、休憩，提昇生活品質之都市空間。

2011 年第 33 次市政會議中，臺中市經濟發展局以「振興中區經濟發展策略」報告書認將中區商業衰退現象歸咎於停車位、中區單向道問題以及騎樓整頓，最後認為振興中區根本之道在「都市更新」。然而當時臺中市規畫仍以西屯為主，如第 33 次市政會議中胡志強認為「市府把現在西屯看成臺中經濟發展的輻射中心，這裡好可以帶動整個臺中發展，梧棲、梨山等地區都可以共享其利」（臺中市政府，2011）。此處也明確指出，胡志強擔任市長期間雖有振興中區經濟政策，然在整體規劃而言以西屯區為發展核心。

[§]同（註 1）。

^{**} 〈市長：中區為中市心臟不可輕言廢棄〉。2003。《臺中市政府全球資訊網》。
<https://www.ud.taichung.gov.tw/917764/post>。2003/06/30。

^{††} 〈第二市場改建將以發揚客家文化為主〉。2002。《臺中市政府全球資訊網》。
<https://www.taichung.gov.tw/910936/post>。2002/08/28。

^{‡‡} 〈百億元救中區 97 年先推星空廊道與城市綠廊計畫〉。2007。《臺中市政府全球資訊網》。
<https://www.taichung.gov.tw/893109/post>。2007/12/13。

二、派系、社區和宗教組織：

中區在 1980 年代末期商業開始衰敗，依照前述研究與政府論述顯示，1990 年後臺中市開始往屯區發展，1986 年後總人口數開始逐年下滑。中區在總數值上雖顯使該地區正逐漸衰退，然而看似商業衰敗地區，傳統宗教和小店家卻留了下來，研究者訪談大誠社區發展協會總幹事得知：

「現在中區人比較少了嘛！沒落了！但是是這樣啦！人少但每個人的信仰都還在，你去看萬春宮每到初一十五，媽祖生日的時候人都很多，人還是會回來。輔順將軍廟農曆九月十四號人都還是會回來，人不在中區信仰中心還在。」
(受訪者大誠社區總幹事)

從上訪談得知，中區商業衰退與總人口數持續減少，然宮廟仍留在中區甚至持續發展。此時本文回到 1970 年代地方派系「張派」發展興盛之時，當時張派盤據於市區，賴派盤據於屯區（王振寰，1996），其中中區為「張派」發跡處，張啟仲從中區合作社開始，透過信用合作社網絡與金源，逐步選上市議員和市長位置，其中現今臺中市公園路上「合作大樓」即為 1950 年代中區合作社所建。研究者訪談過去中區 Y 里里長兒女 A01，現擔任中區 X 宮廟主委。研究者得知中區里長皆被安排為合作社評議員：

「對！賴派他基本地盤在北區，所以那時候中區有很多里長都有安排當中區合作社的評議員」(受訪者 A01)

其中本文依據民國 92 年（2003 年）所廢止之「各種專業合作社章程準則第 22 條」得知，評議員是由社員大會所推派，並有監督合作社董監事之權力，是故張派係將中區里長安排於中區合作社監督重要職位上。

前述張派透過信用合作社與重要職位安排，從中將資源由上往下輸送至中區

里長手中。然在日常生活中利益輸送並非赤裸裸展現在眼前，陳介玄（1994）研究中發現，派系透過「結拜」建立「擬制血親」等「關係」，在鄰里層次建立派系椿腳網絡。臺中市區部分研究者訪問中區前里幹事 A02 得知：

「就結拜啊！包括誰都是..X 里里長、以前的 Y 里甲和乙，現在他在當臺中市議會議長林士昌的特助，都是結拜的！丙也是！這都是他們的結拜！這些都有張宏年在照顧，都會站他們的台，所以他們就選上了！他（里長）要他（地方派系）的勢力阿！中區就這幾個張派的勢力！」（受訪者 A02）

然 2000 年後由中區信用合作社所改制之「第七商業銀行」於 2001 年被國泰金控併購，張派在失去信用合作社後失去經濟金援（王士胤，2017）。2010 年臺中縣市合併後，蔡育軒、陳怡君、王業立（2016）也發現縣籍「紅黑共治」現象移轉治臺中市議會中。原市籍地方派系貌似瓦解，然本文在中區柳川地區的社區和鄰里當中，卻發現過派系網絡和政黨組織正透過宗教組織發展。

張派雖失去大量經濟支援，政治權力看似下降，然張派成員仍掌握市議員職權，並連結國民黨於 2000 年後建立從中央到地方的「社會資本網絡」。而中區里長因為失去地方派系金援，現今里長則依靠宮廟和土地公廟「香油錢」協助里內事務，研究者訪談中區柳里長和鄰長好人緣得知：

「像中區只有馬舍公不是只有給中區，每個人都可以去申請，大廟心胸不一樣。但有的廟就不肯給...自己顧自己的里。土地公廟大部分都是里長在那裏當...不是主委的話，應該都有關係。」（受訪者柳里長）

「一個里對一個土地公廟，土地公廟是信仰中心，大家會去拜拜，拜拜就會去捐款。捐款以後廟的廟產就會跟里辦公室結合起來，然後里長再透過土地公廟的資源辦活動。土地公廟真正的老闆幾乎都是里長，正常的是會這樣子。」

里長是掌控土地公廟的。」（柳川日誌，研究者與好人緣對談）

依照前述柳里長和好人員訪談，研究者再去蒐集中區周圍附近土地公廟主委與里長關係。發現如好人緣所述，里長換以擔任要職或安插要職方式取得廟宇運作權力，本文將臺中市區柳川地區鄰近土地公廟與里長關係以表 5-2 表示：

表 5-2：臺中市區柳川地區鄰近土地公廟

名稱	主神	里別	備註
竹圍福德宮	福德正神	中華里	中華里里長擔任監察委員
光音福德祠	福德正神	大誠里	廟宇主委為大誠里鄰長
中正福德祠	福德正神	大誠里	大誠里里長擔任顧問
武德宮	關聖帝君	大墩里	大墩里里長擔任常務委員

資料來源：本文自行蒐集

除里辦公室結合土地公廟外，柳里長所述之中區「大廟」平時則扮演提供「社會救助」資源角色，救助範圍正如柳里長所述是跨行政區，只要有需要便得以向宮廟申請急難救助。

在這套宮廟和里辦公室合作模式下，政黨和派系將此模式複製到選舉動員當中。張派雖失去信用合作社網絡，縣市合併後也失去議長職位，其規模於 2010 年後並未達到「縣市層級」，不能以「地方派系」稱之（廖忠俊，2007）。然而張派成員仍保有市議員職位，且更與國民黨合作建立從中央到地方政治權力網絡。此時在鄰里層級上，里長雖持有宮廟經濟資源，然缺乏「社會資本」等政治權力提供，此時宮廟主委和里長仍仰賴張派和國民黨協助「喬事情」，研究者訪談馬舍公董事長得知，過去馬舍公曾因國民政府來台後未做登記土地，差點面臨收歸國有被迫遷移問題，最後在國民黨籍立委和張派議員協調下，順利解決此事件。

又於經濟資源上，雖張派失去信用合作社，然張派仍透過剩餘資金開辦私人公司，並籌辦「中區慈善會」協助中區里長援助「邊緣戶」；政黨則成為既有慈

善會之仲介人，透過鄰里長系統協助媒合「邊緣戶」。本文所指邊緣戶是中區里長所創，形容居民經濟狀況不佳然因仍有子女等因素，無法申請「低收入戶」證明等居民。政黨和派系將宮廟香油錢捐贈模式，複製到選舉動員上。

研究者獲得柳里長同意觀察發給補助金過程，剛到里長家時里長媽媽正在看電視，里長家裡沒有什麼人，而里長則在旁打電話通知民眾領救助金。功德哥走進里長家他身穿「O 功德林」機構背心。此時研究者發現想起過去曾見過功德哥身穿「立法院最高顧問沈智慧」的助理背心，此時功德哥拿起手機開始聯絡邊緣戶領救助金，電話接通後第一句便講到：「您好！我是 O 功德林！沈智慧辦公室」。就這樣他打了五通電話，過不久民眾走進里長家中。功德哥將補助金給邊緣戶後，會與邊緣戶自拍表示補助金以發給民眾，研究者在旁聽到：

柳里長：「11 月 24 日要來選舉喔！現在我們這裡是好幾個喔！」

里民 A：「有好幾個都不認識，好幾個...」

柳里長：「都不認識沒意思吼！如果他拿給你你好康你都拿，但是投給我就

好了啦！我住在這裡也好找！他住在西區餒！」

里民 B：「那一定要選的！」

柳里長：「一定要出來喔！你叫一下你們家阿林仔也出來投，里長不是英英

沒事做餒！有很多事要做餒！」

里民 A：「妳忙成這樣...」

柳里長：「現在才回來餒！剛剛去廟忙東忙西」

里民 B：「真辛苦，冒大雨餒！（當時雨下得很大）」

（柳川日誌，柳里長與里民對話）

從上事件可得知，O 功德林是透過政黨作為媒介，而政黨再以里長為媒介，向下尋找案源。然政黨與里長可透過發放補助金方式獲取未來政治支持，其中「名義」為可積累的社會資本。但該社會資本的取得仍有其規則（Norms），如政黨遇

上越級通報的邊緣戶仍會告知當地里長，而他里里長遇上越界通報的邊緣戶，則會要求邊緣戶回去通報自己里里長，藉此維持彼此間關係。最後研究者詢問功德哥，沈智慧辦公室和 O 功德林關係為何：

「O 功德林是一位企業家，他以前生意失敗，背了幾十億的負債。後來他翻轉成功，他就每年拿兩千多萬出來做『鰥寡孤獨傷殘』救助，有生活困苦他都會來幫忙。我們就是...中部就我們負責審查啦！他們做大功德，我們做小功德」（柳川日誌，研究者與功德哥對話）

依照功德哥所述以及田野觀察，政黨透過自身網絡找到金主，並且透過里長等樁腳網絡向下尋找案源，在發放資源同時亮出身分，藉此爭取政治支持度，但此利益交換又被宗教信仰「功德」所模糊。

政黨和派系除複製宮廟和里辦公室模式外，自身是否有涉入「宮廟組織」甚至社區發展協會當中？本文在前述有提及，政黨和派系形成的「由中央至地方」的網絡協助馬舍公處理土地問題，研究者訪談馬舍公董事長得知，過去由「結拜」所締結的擬制血親網絡至今仍傳遞給下一代：

「那是上一代的淵源，前一個董事長也是前一個里長他是張派的。我爸爸做鄰長也都掛張派的，那個時候是張啟仲，也是因為這個淵源我才挖張派。」
（受訪者董事長）

在「大誠社區發展協會」成立上也與「張派」成員有所關聯，馬舍公董事長為大誠社區發展協會第一任理事長。2002 年臺中市施行「新制里鄰區劃」將中區 25 里縮減為 8 里。此時中區 X 里合併前多位里長有結拜關係，不想因選舉競爭而破壞彼此兄弟情感，是故請馬舍公神明作證以擲杯方式決定誰出面參選，最後由原 A 里里長抽中。研究者問起第一任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得知：

「我先當社區理事長，那時候是我創會。為什麼要去籌組，就是我里長擲杯擲沒中，抽籤被 A 抽走。張光儀對 A 父子印象不好，以為我被他們銃康，就把當時的區長叫去問。區長為了要給張光儀一個交代，叫我創立社區發展協會，要做給張光儀看。」（受訪者董事長）

大誠社區發展協會會址座落馬舍公地下室，至今馬舍公提供協會場地與水電費，而協會的社團表演會支援馬舍公廟務活動。最後本文將中區柳川地區土地公廟、宮廟理監事名單、鄰里長和大誠社區發展協會理監事名單進行交叉比對，整理出表 5-3，發現協會董監事多數以宮廟和鄰里長所組成：

表 5-3：大誠社區理監事名單對照表

職稱	姓名	備註
名譽理事長	張宏年	臺中市市議員、輔順將軍廟榮譽理事長、中正福德祠顧問、武德宮顧問
會務顧問	A	萬春宮住持
會務顧問	B	輔順將軍廟顧問
理事長	C	輔順將軍廟常務董事、竹圍福德宮主任委員
常務理事	D	柳川里里長、輔順將軍廟董事
常務理事	E	大墩里里長、輔順將軍廟董事、武德宮常務委員
常務理事	F	輔順將軍廟董事
常務理事	G	竹圍福德宮委員
總幹事	H	竹圍福德宮委員
理事	I	輔順將軍廟監事、柳川里鄰長
理事	J	（因研究者田野位置困難尚未得知）
理事	K	光音福德祠主委、大誠里鄰長
理事	L	柳川里鄰長

資料來源：臺中市區大誠社區發展協會第四屆第四次（民國 107 年 4 月 29 日）會員大會手冊

表 5-3（續）：大誠社區理監事名單對照表

職稱	姓名	備註
理事	M	中華里鄰長
理事	N	大誠里鄰長
理事	O	中華里鄰長
理事	P	大誠里里長、中正福德祠顧問
理事	Q	柳川里鄰長
理事	R	（因研究者田野位置困難尚未得知）
常務監事	S	輔順將軍廟常務監事、柳川里鄰長
監事	T	輔順將軍廟董事、柳川里鄰長
監事	U	中華里里長、輔順將軍廟監事、竹圍土地公廟監委
監事	V	（因研究者田野位置困難尚未得知）
監事	W	（因研究者田野位置困難尚未得知）

資料來源：臺中市中區大誠社區發展協會第四屆第四次（民國 107 年 4 月 29 日）會員大會手冊

三、藏匿於社區和鄰里的「香油錢關係」：

依照前段描述得知，2010 年後張派雖失去信用合作社，甚至在市議會議長職位失去取得優勢，勢力已非「縣市」規模而已「派系」稱之。然派系可與政黨合作建立從中央到地方的資源輸送網絡，並複製宮廟救助邊緣戶模式，在里長需要經濟和政治權力協助時，透過慈善機構如本文提及之「慈善會」，或是利用自身職位提供宮廟協助，甚至協助宮廟董事長創辦社區發展協會。

然此種由上而下的利益輸送，最後又受到「結拜」以及功德哥提及之「功德」模糊主從關係。派系和政黨抓住社會福利之「灰色地帶」，以及里長找資源取之需求。本文以 Nan Lin（2005）社會資本角度，亦即社會資本為網絡中資源，網絡成員從中向未來投資，並取得社會資本。而派系、政黨甚至里長透過救助金發放，對里民向未來進行政治支持度投資，在選舉之時進行投票動員，研究者訪談

好人員時，好人緣以「食物鏈」說明此種循環：

「選舉服務就是人情麻！選舉到就是要還人情。平常你有需要的時候找我，我幫忙。但到了選舉時我就跟你講說：『選舉的時候他（里長）找我，我就找你』我稱這個叫食物鏈！還人情啊！」（柳川日誌，研究者與好人緣對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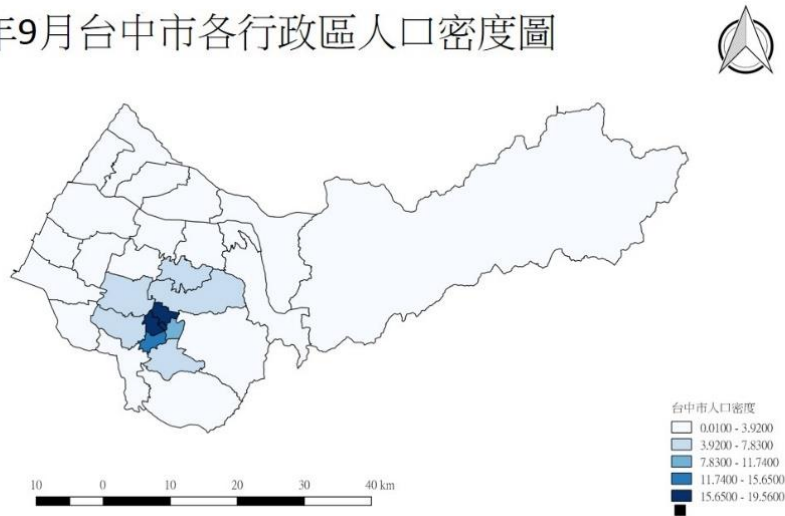
此時派系、政黨和里長平時的協助，被里民的日常生活文化認知為「人情債」甚至是「功德」，進而忽略彼此主從關係。此時掌握政治與經濟權力的派系成員向下輸送利益，甚至出面做主調解糾紛讓民眾欠下人情。而網絡階層較低的民眾透過結拜宣誓忠誠模糊彼此主從關係。兩者間關係如同「香油錢」般串聯網絡階層從高至低的成員，信徒並非一味投資香油錢就能獲得回報，而是要抱持「虔誠」態度捐獻，信徒捐獻越多香油錢信仰變越堅定，甚至信仰模糊彼此間主從關係。

本文以「香油錢關係」稱此特殊恩庇侍從關係存在，並認為「關係」此種由宗教和血緣所構成的傳統連帶成為權力上下階層最好的「黏著劑」。如同 Putnam（2000）所述之「黏著性社會資本（bonding social capital）」，香油錢關係將不同權力位階成員黏著再一起，透過宗教或文化倫理關係消弭彼此權力上的不對等。然而本文認為香油錢看似為個人信仰，但彼此社會資本存量仍不對等，然該不對等關係又被從上一輩情誼以及日常生活私交所模糊。

最後本文回到「都市化促使派系式微」（高永光，2001）的理論，本文發現中區為早期都市化地區，雖有總人口和商業衰退的歷史，然至現今如圖 5-1 GIS 蝶圖所示，中區仍為人口密度高地區，且存有傳統宮廟和小店家，派系和里長之間仍保有過去「結拜」情誼。

圖 5-1：107 年 9 月臺中市各行政區人口密度圖（中間深藍色區為中區）

107年9月台中市各行政區人口密度圖



資料來源：本文自行繪製

派系和政黨產生連結，中區留下小店家甚至因商業發展而出現的宮廟成為新的利益競逐地點。如同張茂桂、陳俊傑（1986）所述現代化「中等發展」地區，一方面具備足夠競爭力，二方面又有傳統社會關係基礎。是故早期都市化地區，因為人口遷出且留有小店家及宮廟，最後成為派系政治發展的優良環境。中區雖有商業與人口成長「衰敗」的歷史，卻成為派系政治「蓬勃」發展的條件。

然而中區所建立的香油錢關係，除前述本文認為模糊主從關係，但仍建立社會資本不對等當中。甚至在水平的組織差異衝突上，香油錢關係並未消弭衝突。如同 Putnam（2000）所述，「黏著性社會資本」雖有助於建立綿密的情感關係，然同樣使得網絡成員排外。此時由香油錢關係而建立的派系網絡仍保有派系「衝突」的單位，與「交換」的二元結盟關係（陳明通，1995）。社區組織甚至組織內部仍有衝突產生，研究者訪談大誠社區發展協會志工 A03 得知：

「我剛來大誠社區關懷據點的時候，以為大家都和睦相處，許多鄰里長志工陪伴長者。但後來有位老人家跟我說：『你沒有發現這裡是『王不見王』嗎？』此時我才發現里長之間很少同時出現在關懷據點。」（受訪者 A03）

此時雖香油錢關係解決社會福利，甚至社區發展協會場地上等日常生活問題，然香油錢關係仍存在彼此差異上衝突，以及權力位階上的不對等。若以 Putnam (1993) 水平、多元且密集之市民團體網絡定義市民社會，由香油錢關係所建立的「舊政治」並不具備市民設為意涵，甚至派系政治留下「衝突」性質有害於市民社會本身。如何動搖香油錢關係則為促進市民社會發展重點，2015 年後因為新市長政策而出現於中區的「新社群」於 2017、2018 開始於舊社群合作，進而使香油錢關係產生動搖。

陸、「一次性關係」和「絆」：

2011 年臺中市政府經發局將都市更新視為復興中區經濟的重點，然中區因為產權複雜不明，且政府與地方溝通投入成本過高，導致閒置土地多成為都市更新的一個絆腳石（吳昱賢，2016）。再加上胡志強主政時期，臺中市屯區為主要開發地區，中區都市更新速度減緩，開始朝向「都市再生」的方向前進。

一、新政策與新社群進駐：

2012 年臺中市政府委託東海大學執行「臺中市舊市區再生計畫研究案-臺中市舊市區都市再發展行動計畫」，東海大學於過去位於中區中山路上第一銀行舊址設立「中區再生基地」，此後中區出現藝術家 and 社會企業如「好伴」等團體開始進駐。2015 年林佳龍當選臺中市市長後將「都市再生」視為復興中區經濟方針，2015 年臺中市都市發展局提出「文化城中城」方案。有別於胡志強時期的客家「中華文化」風格與都市更新經濟發展，林佳龍透過日治時期臺中市區現代化的歷史，將中區創造「舊城區」一詞，藉此創造臺中主體性（黃子倫，2018），其中臺中市參與式預算同為 2015 年時期產物。

2016 年臺中市文化局正式將「區域型社造中心」納入社區營造計畫當中，並預計於 2019 年並預計於 2019 年於全臺中 29 個區公所設立區域型社造中心（盧思岳，2017）。在老人長照上 2015 年臺中市政府推動「托老一條龍」^{§§}，透過社

^{§§} 〈中市托老一條龍 橫跨預防準備與長期照顧 打造宜居城市〉。2015。《臺中市政府全球資訊網》。<https://www.tax.taichung.gov.tw/968801/post>。

區、政府與醫療資源建立老人長照系統（呂建德，2016），往後並推動「721 政策」，將老人分成四階段進行照顧。2016 年衛福部「長照 ABC」，臺中市獲得衛生福利部 7.7 億元補助，以此為基礎擴大老人服務項目^{***}，並增加社區關懷據點補助如水電費與場地費^{††}。

奠定於 2012 年中區再生基地、藝術家和社會企業等新社群進駐，2015 年「新市府」推動臺中市參與式預算、社區營造點、以及社區關懷據點和長照 ABC。上述政策和市民團體進駐促使如「台灣社區重建協會」進駐，並於 2017 年創設「愛社享生活文化有限公司（下稱愛社享）」；2015 年台中參與式預算偶然開啟臺中「審議式民主」市場，促使 2015 年臺中參與式預算民間學術團隊創辦「眾議工作室」和「熱吵民主協會（下稱熱吵民主）」，熱吵民主最後進駐中區並和愛社享共處相同大樓與樓層。中區再生基地進駐吸引藝術家進入中區，於本文研究範圍中區柳川地區於 2017 年初出現東海大學建築系學生團隊，為了完成畢業製作而在柳川附近之老屋進行維修改造，並創辦「柳美術館」；2018 年東海大學奠基中區再生基地基礎，承接科技部「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網頁名稱為新作坊）」，該計畫主要為透過議題研究與社會行動方案設計，進行在地研究和實踐^{†††}。東海大學在新作坊底下設立「社會實踐暨城市創生中心（下稱城市創生中心）」，設點於臺中市區。

最後為 2015 年上任之中區黃區長的改變促使區公所成為媒介，將社區營造、社區關懷據點和長照 ABC 政策資源帶入中區柳川地區。2016 年天主教台中教區為處理臺中市區教會擁有之閒置空間，該閒置空間位於聖心修女會，此時天主教臺中教區與聖心修女會合作，並接受黃區長建議開始創辦「社區關懷據點」成立「聖心關懷據點」，並於 2017 年創設倡設長照 C 據點於聖心關懷據點。大誠社

^{***} 〈中市托老一條龍呼應中央長照 2.0 成果豐碩 明年擴大服務項目〉。2016。《臺中市政府全球資訊網》。<https://www.taichung.gov.tw/988019/post>.

^{††} 〈107 臺中市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整合性補助實施計畫〉。2018。《臺中市政府社會局》。<https://www.society.taichung.gov.tw/880452/post>.

^{†††} 〈計畫緣起與願景〉。2012。《新作坊》。<https://www.hisp.ntu.edu.tw/about>.

區發展協會同時接受黃區長建議，於 2016 年創設「大誠社區關懷據點」，研究者訪談大誠社區總幹事得知：

「現在這個關懷據點能做成這樣子，完全是黃至民區長一手促成的，要不然做不起來！黃區長在後面給我們很大的助力，不管出錢出力。賣畫、賣明信片全部都無條件捐給社區，不然只有那點錢，社區要怎麼用？。真的啦！也很感謝他拉！」（受訪者大誠社區總幹事）

大誠社區總幹事也稱，黃區長在社區關懷據點前後透過賣畫與明信片，前後捐贈十萬餘元經費給大誠社區。研究者訪談黃區長時得知，過去區公所並鮮少主動與社區組織接觸；研究者另訪談中區樂齡中心主任王圓圓，同樣得到相同答案：

「就是承辦窗口這樣子而已，做比較程序上的活動。你說要推廣社造，擾動社區的部分比較被動啦！公所要走出去！我有請各科室要跟協會對口，因為區公所以往比較被動，有人來申請資料而已。」（受訪者黃區長）

「講到民政課就好玩了，他們都好像跟我們有距離我也不懂。」

（受訪者王圓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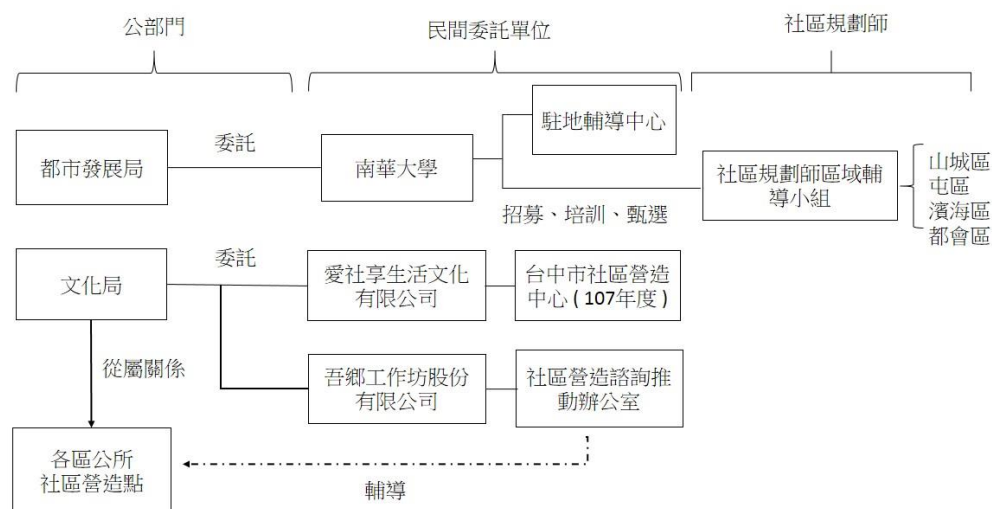
此時臺中市於 2012 年後接續受到新社群、新政策、以及區公所等要素，最後在 2017 年新舊社群開始在都發局和文化局所承辦的「社區營造」進行合作。2018 年中區區公所也設立「社區營造點」，並透過過去區里行政基礎，

二、社區營造與社區關係：

臺中市社區營造係由多個地方政府局處-社會局、衛生局，都發局和文化局各自承辦，其中都發局和文化局兩個局處所舉辦之社區營造為社區自己提案，且設有輔導單位。然兩個局處社區營造組織不盡相同，甚至各自擁有獨立的副導團

隊，本文以圖 6-1 表示兩局處社區營造輔導單位之差異。

圖 6-1：臺中市都發局和文化局社區營造組織比較圖



資料來源：本文自行繪製

都發局和文化局舉辦社區營造除組織上差異外，兩個局處又有「軟硬體」上的區別，研究者訪談中區區公所承辦中區區域型社造點計畫人文課課員「艾雅」得知：

「都發局的社造是在硬體設備，他們會去改善社區硬體部分，像是做一些地景的部分，然後文化局社區營造強調的是『人』，所以一個是硬體，一個是軟體。」（受訪者艾雅）

最後本文再查兩局處社區營造，文化局和都發局上級計畫皆不相同，本文以表 6-1 呈現之。是故本文依照局處的不同，將社區營造係分為「都發局社造」和「文化局社造」。都發局社造和文化局社造相繼在 2017 年和 2018 年由黃區長帶入中區柳川地區，其中 2017 年都發局社造柳川里環保志工隊參與提案，都發局社造的社區規劃師「山谷百合」透過其他社規師認識柳美術館，進而促使柳川里第一次的「新舊社群合作」；第二次則為中區區公所設立「社區營造點」，並委託「熱吵民主」為民間協力單位。於中區柳川地區部份，區公所邀請柳川里環保志

工隊、大誠社區發展協會、聖心修女會、以及中區樂齡中心施作。以下為研究者自己為視角，說明於 2017-2018 年實際參與社區營造過程。

表 6-1：臺中市都發局和文化局社區營造差異表

社區營造類別	上位計劃	下位計畫	輔導單位
都發局社造	內政部城鎮風貌型塑整體計畫	臺中市社區規劃師駐地輔導計畫	臺中市社區規劃師駐地輔導中心
文化局社造	文化部社區營造三期及村落文化發展計畫	「一區一特色」暨「區域型社造中心」實施計畫	臺中市社區營造中心、各區公所

資料來源：本文從內政部營建署和臺中市社區營造推動網蒐集資料並整理^{§§§}。

（一）社區營造中的「一次性關係」：

大誠社區發展協會為柳川里、大誠里、大墩里和中華里為四里聯合，是故當時柳川里里辦公室是以「大誠社區發展協會」參與都發局社區營造。主要以柳川里「柳里長」為核心，並動員底下環保志工隊進行社區營造。柳川里環保志工隊中由鄰長和里民志工組成，鄰長為志工隊之當然成員，所有志工皆為柳里長之「手足」，所有社區營造決策事項須經過柳里長同意或認可方得執行。

志工隊志工年齡層大約在 55 歲以上，且為女性居多，39 為志工僅有 5 位為男性志工。研究者係於 2017 年透過環境教育呂老師帶領，先後認識柳里長和鄰長「花媽」，研究者再參與兩三次環保志工隊聚會和掃地才開始與鄰里長們認識。2017 年 11 月研究者透過花媽，得知柳里長參與 106 年度都發局社造提案，事後研究者訪談柳里長得知參與都發局社造是為了找資源：

「那社造因為是...每次環保都是我拿錢出來做的，都是我自己出錢的餒！像我們里裡面沒有廟，錢是我自己要出錢的餒！」（受訪者柳里長）

^{§§§}內政部。2014。《城鎮風貌型塑整體計畫（102 至 105 年）》。

<https://www.cpami.gov.tw/kids/filesys/file/chinese/dept/up/up102-105.pdf>.

〈105 年度委託區公所辦理「一區一特色」實施計畫暨區域型社造中心試辦計畫〉。2016。《臺中市社區營造推動網》。<http://community.culture.taichung.gov.tw/form/index-1.asp?Parser=2,18,54,...,63>.

本文回顧表 5-2 可以發現，中區柳川地區的土地公廟皆集中在大誠里和中華里，大墩里則於第二市場內有「武德宮」關聖帝君廟，關聖帝君同為「武財神」，具有與土地公相同性質。沒有土地公廟的柳里長，因為馬舍公和萬春宮主要補助社會福利部分，里內建設柳里長只能依靠參與式預算和社區營造。

起初柳里長因為社區人才欠缺電腦文書人員，並未打算參與都發局社造。最後是研究者自願協助柳里長寫計畫書，花媽才願意協助柳里長上課和提案，至此才有 106 年度都發局社造「漫蔓柳川古道」提案，施作地點則為 2015、2016 年臺中市參與式預算補助下，於中山路 257 巷的「柳川古道」。

然而社規師「山谷百合」擔憂柳川里里內沒有設計專長人才，且山谷百合透過其他社規師介紹，認識同座落於柳川古道內「柳美術館」團隊，研究者社區營造後訪談山谷百合得知：

「我基於希望看到更多年輕人投入社造這個基礎之下，我希望讓更多年輕人接觸社造。基本上柳川里沒有人會畫圖，招弟她本身會畫圖，所以一開始期待她可以幫助這部分。」（受訪者山谷百合）

柳美術館是由東海大學建築系學生所組成的團隊，主要帶頭的學生為東海建築系大學生「招弟」。然而研究者在都發局社造後訪談招弟得知，她對柳里長的「美學」感到不滿，甚至想透過社區營造來改變柳川古道的「環保美學」：

「我不知道社區營造是什麼，我只有聽林老師（社規師）說里長要做環保美化，我只是想要改里長的設計而已。我的想法就只有這麼簡單！就是設計師給建議，施作要給柳川里自己來做！她們自己再找工人做！」（受訪者招弟）

山谷百合向招弟提議，在柳川古道設置文史牆來改造柳里長環保要素，招弟認同此提議，並接受山谷百合邀請參與社區營造。此時社規師山谷百合希望招弟

能協助柳里長畫圖，甚至讓雙方透過社區營造建立出合作情誼。然而招弟卻沒有此意願，甚至想透過社區營造改變柳里長在柳川古道之設計。這種相互利用的結果造成招弟在都發局社造中期，招弟因為自身問題而失去聯絡，山谷百合和花媽難以聯絡招弟心急，在社造結案前兩個月請求柳里長替換招弟，請臺中市南區工學社區之「木工達人」協助施作。研究者在都發局社造後訪談招弟得知，當時招弟正在處理柳屋產權問題無暇處理社區營造：

「那時候我很忙！那時候超級崩潰，那時候基金會要解約，那時候我超崩潰不知道我在幹嘛！因為超崩潰所以狂在學校做模型。我不想再拖！我超想畢業！那時候就很崩潰！」（受訪者招弟）

在招弟失聯期間，山谷百合和花媽雖請求更換施作者，然柳里長因為不認識工學里木工達人，不想把提案交給「不認識的人」進而拒絕請求。最後在結案前 45 天招弟恢復聯絡，並接連趕工社區營造施工設計，最後仍在期限內完成社區營造施作如，招弟也取得柳川古道文史牆的施作權。

圖 6-2：106 年度都發局社造前後對照表（地磚為參與式預算經費所鋪設）



資料來源：本文自行攝影與整理

圖 6-2（續）：106 年度都發局社造前後對照表（地磚為參與式預算經費所鋪設）



資料來源：本文自行攝影與整理（圖右古井原照為花媽提供）。

然而社造過程中，因為柳川里環保志工隊是以柳里長為核心，所有人都不得與里長提出異議，這導致招弟時常在忍受柳里長威權式的合作模式，而柳里長則要忍受招弟拖延工作進度的個性，兩者相互忍受。研究者事後訪談招弟時得知她在社造過程中與柳里長相處不愉快：

「跟鄰里長討論真的花超多時間！我覺得超煩！為什麼那些文字是我坐在你旁邊等妳一個一個字看過！那時候超崩潰！我那個時候超不爽！」

（受訪者招弟）

最後這兩個組織衝突在 106 年度都發局社造結束後爆發，柳里長又因為觀光客看不懂招弟所設計之地圖，以「地圖很醜」為理由通知山谷百合處理，山谷百合則連絡招弟與里長解釋。當時研究者在現場記錄整個情況：

柳里長：「吼！妳這個圖怎麼這樣！好多遊客都說看不懂！」

招弟此時深吸口氣說：「不會啊！我看得懂！而且要改圖也要即時說，我最近趕畢業，也要等我五月底才能弄！」

旁邊鄰長看到招弟便說：「啊妳這圖怎麼畫這樣？我們都看不懂！」

四周傳出責備招弟聲音，好人緣湊過去對招弟說：「我覺得你的圖畫得很好，

沒有錯，只要立起來就好」。

山谷百合：「這邊只要再加個指北針跟現在位置就可以彌補了！」

柳里長：「妳是年輕人啊！要想想我們這老人家」

招弟大聲說：「那妳也要想想我們啊！不是說要將心比心嗎？妳知道這圖一改就是重畫嗎？」

山谷百合：「對啦！所以只要加個指北針跟現在位置就好了！」

（柳川日誌，招弟與柳川里環保志工隊衝突）

雖山谷百合當時平息兩者紛爭，並要求招弟事後在地圖增加「指北針」和「現在位置」，然招弟取得文史牆施作權，並成功阻止柳里長在柳川古道內加入環保要素，獲得利益後便解除合作，至今該地圖並未修改完成如圖 6-4，且之後柳里長和招弟並無任何合作關係。

圖 6-4：柳川古道文史牆導覽地圖



資料來源：本文自行攝影，攝影時間 2019/04/07。

2018 年 6 月時柳里長又參與文化局社造，此次社造是由中區區公所所承辦，並邀請到大誠社區發展協會、聖心修女會、中區樂齡中心以及綠川旁的福爾摩沙青創基地。此時中區柳川地區社區組織便有四個組織參與，柳里長也因為大誠社區自行參加緣故，是故透過區公所找到中區另一個社區發展協會「綠

光社區發展協會（綠光社區）」借牌參與。研究者擔任計畫書文書角色，然而與去年不同，研究者此時抓住回顧去年柳里長和招弟狀況，發現柳里長為了完成個人利益，願意與新社群合作。是故研究者希望透過社區營造與柳里長做利益交換，誘使柳里長做出社區參與活動。

研究者不同於去年在 2018 年文化局社造採取行動，因為文化局社造是「軟體」人文方向，且 2018 年 11 月為地方選舉，是故花媽想幫柳里長做社區報協助里長選情，而柳里長則想在柳川古道舉辦寫生活動，讓更多里民看到柳川古道政績。此時研究者以「畫出我的柳川古道」為計畫名稱，希望讓所有人一同畫出自己心中的柳川古道，藉此建立柳川里的社區意識。研究者也透過預算書中「誤餐費」，將活動分配工作的便當錢編入計畫書中，最後研究者再透過環保志工隊每個月兩次聚會，以「誤餐費」核銷為由誘使柳里長利用志工聚會「公開」分配工作，當時研究者與柳里長談話如下：

研究者：「里長！我們寫生活動的時間快到了，想跟你先約個時間討論工作分配的事情。」

柳里長：「啊啲！那還很久餒！急什麼！」

研究者：「可是我們也要核銷餒！我們有工作坊的『誤餐費』要核銷掉。我在想跟里長借下次環保志工聚會時間分配工作，讓志工自己來認領工作，這樣就可以讓志工同時拿便當又可以拿雞蛋糕，順便把工作坊的經費核銷掉。」

柳里長：「好啊！這樣可以同時拿到便當和雞蛋糕，很好餒！」

研究者：「可是誤餐費我們只有編 20 個人餒！」

柳里長：「啊！這樣不夠餒！不然剩下的錢我來出，這樣大家一定很高興！」

（柳川日誌，研究者與柳里長對話）

研究者透過「雞蛋糕」與社區營造核銷誘使柳里長公開分配工作，在分配工作當天，鄰長也以「雞蛋糕」和「便當」來區分社區營造和志工隊聚會的簽

到表。研究者當天也從與里幹事談話得知，這次活動分配工作是柳里長 20 幾年擔任里長以來第一次「公開」分配工作如圖 6-5。

圖 6-5：環保志工聚會分配工作狀況



資料來源：本文自行攝影，拍攝時間：2018/08/21。

寫生活動當天我拿著活動報名明細，預先報名的人數有 60 幾位，但到活動結束後又多出 20 幾位。其中部分家長得知寫生活動是用文化局經費申請，以為可以獲得臺中市文化局獎狀，所以督促家中小孩報名，希望可以獲得獎狀替孩子申請好的高中或大學；我親身遇到則是在跟古巷旁的店家聊天時得知：

研究者：「這是這裡第一次辦這個活動嗎？」

店家 A：「以前有啊！就是糖果街...」

研究者：「喔！2009 年那一次！」

店家 A：「對！後面就沒有了！實際上里長本來就要經常辦這種活動，才有意義嘛！要不然做成這樣，巷子就沒有人啊！妳看第二市場多火！興中街...」

研究者：「妳叫里長多辦。」

店家 A：「真的要多辦！她不辦就快要選不上了...」

（柳川日誌，研究者與店家 A 談話）

此時研究者才意識到這次的活動再次被居民視為「里長的工作」，柳里長為選票而做的活動。寫生活動後緊接者社區報，研究者當時以為經過這次寫生活動有助於改善柳川里「領袖命令型」的組織文化，社區報部份可以再擾動柳里長再次公開徵稿。然而柳里長這此想將社區報交給身旁信任的人「牛肉哥」負責，研究者和花媽曾試圖說服柳里長公開徵稿，但柳里長以「不專業」為由拒絕請求，最後同在社造截止日前一個月牛肉哥以「未答應里長」為由，拒絕撰寫社區報文章。此時社區報執行回到花媽和研究者手中，研究者和花媽討論後決定向柳川里附近的社區組織邀稿，研究者當時認為難以用一個月時間想民眾公開徵稿，並且製作社區報完畢，是故同意此退而求其次的決定，並且負責社區報兩篇文章撰寫，又因為正逢地方選舉，研究者也接下撰寫柳里長「人物專訪」朝上的社區報的任務，另一篇研究者則透過 GIS 疊圖以「昔日的柳川古道」為題撰寫古道歷史。

然而在研究者完稿並交出文章後，研究者接到花媽訊息，得知柳里長不滿意人物專訪，「昔日的柳川古道」則因為柳里長看不懂古地圖遭到刪除 GIS 疊圖的結果，當時花媽像研究者稱：

「紹誠！里長真的很糟糕餒！之前那篇專訪里長一直很有意見。一下說哪個用詞不好看，一下說要加什麼感謝守望相助隊啊！還有南投的什麼宮廟，文章一直修奇怪餒！之前都不是看過了嗎？她一直對她專訪很有意見，說字太多沒人看！放圖！然後把報紙丟出來叫我們學學她，可是我跟里長說那是報紙，跟社區報不一樣，但里長說都叫『報』有什麼差別。」

（柳川日誌，研究者與花媽對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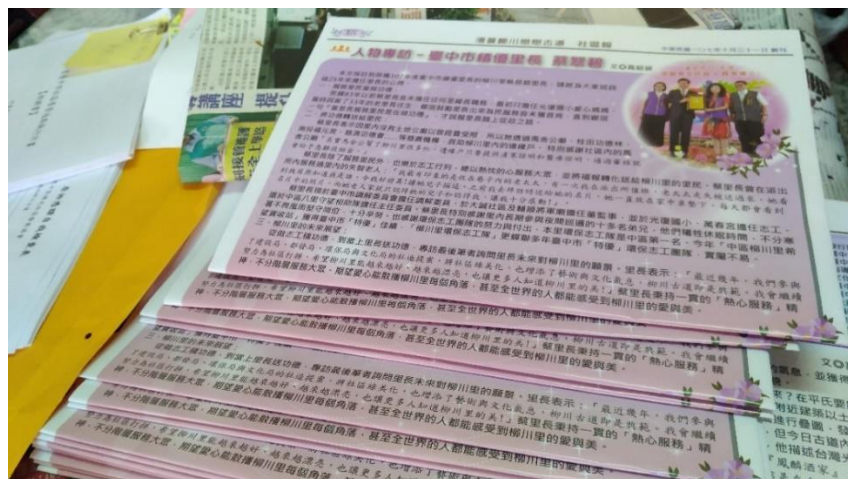
當時研究者再次覺得社區營造已經失敗，將所有心力轉向大誠社區社區營造施作。事後研究者與花媽在社造結案後，為製作核銷書來到里長家拿私章。此時研究者才看到第一份社區報試印版如圖 6-6，和攤在桌上已經印製完成的社區報。

圖 6-6：被劃「刪」的 GIS 疊圖



資料來源：本文自行攝影，拍攝時間：2018/10/26。

圖 6-7：「人物專訪」朝上的社區報



資料來源：本文自行攝影，拍攝時間：2018/11/05。

社區報全部朝向「人物專訪」紫色一面擺放如圖 6-7，人物誌內容幾乎被更動。花媽向研究者稱社區報是里長動員附近鄰長連夜整理，前幾天里長已經帶幾位鄰長開始挨家挨戶向里民拜票，並贈送社區報一份。另外花媽也告訴研究者，社區報所有照片都被更動，照片必須要有柳里長。然值得慶幸的是，完稿的「昔日的柳川古道」GIS 疊圖地圖並未被刪除，花媽解釋說：

「那是我堅持放的啊！不然全部都是里長的個人宣傳還得了，搞不好還會被檢舉為選舉刊物。你看社區報的照片全部都有里長，里長真的把它當成個人

宣傳，如果不放一些文史的文章，我們柳川里會被說素質差餒！這些社區報都是里長昨天叫鄰長把社區報摺成這樣，全部都是人物專訪朝上。」

（柳川日誌，研究者與花媽對談）

然而經過此次事件後，研究者並未再協助柳里長做計畫書書寫。研究者認為這次社區營造又再次淪為「純粹利益交換」，雖促使柳里長公開分配工作，且讓居民自行畫出心中的柳川古道，且最後在活動中被刊登。然而居民將此視為柳里長為了選票而做的活動，「寫生活動」和「里長選票」就此產生連結。接下來的社區報也成為選舉宣傳，研究者並未成功擾動柳川里進而離開田野。

Desmond（2012）在美國 Milwaukee 高度貧窮地區發現，拆遷戶為了生存會與新結交的鄰居保有「一次性關係（disposable ties）」。居民彼此間會為了對方特別的利益與對方產生關係，從陪伴、結為好友到性關係，目的是為了獲取利益。然在獲得利益或危急情況消逝後，這種關係變隨之結束。本文依照研究者實際參與經驗，發現上述都發局社造和文化局社造接發生此問題。如招弟為取得柳川古道施作權，忍耐柳里長威權式的合作文化；柳里長則需要忍受招弟工作態度，最後彼此雖完成社區營造施作且達到各自目的，然彼此也在社造後拋棄合作關係，都發局社造中所建立的關係「一次性」的出現並消失。

在文化局社造中，研究者甚至沒有獲得自身想完成的目的，同樣完成社區營造，研究者卻因為施作失敗而拋棄與柳里長合作關係，進而回到學校撰寫論文反省之。此時本文發現，社區營造雖吸引不同組織投入，且不同組織皆抱有各自利益前來參與，然社區營造發生「一次性關係」卻與雙方有無完成利益無關，招弟和柳里長皆在社區營造中完成自身利益，並隨即解散。而研究者則未完成自身利益，也在社造完成後拋下柳里長合作關係。此時本文認為要讓「社區動營造做的持久且有意義」（楊弘任，2014），則不能在依靠「利益交換」下的社區營造。

（二） 建立在「共同施作」和「共同認知」的「絆」：

2018 年中區區公所除邀請到柳里長進行社區營造施作外，同時也邀請到其

他中區的社區組織進行參與，而在本文研究範圍「中區柳川地區」便有大誠社區發展協會、聖心修女會以及中區樂齡中心。這三個組織皆有參與社區營造之目的，大誠社區是希望透過社區營造來讓關懷據點更加豐富、聖心修女會則是希望透過社造讓中區的人知道天主教在中區的歷史、中區樂齡中心則是希望透過社區營造增加當地居民情感。

除前述中區既有社區組織外，2017 年進駐之「熱吵民主」和從台灣社區重建協會成員創辦之「愛社享」也在此時加入 2018 年中區社區營造點計畫。與研究者策略不同，熱吵民主和愛社享是抓住在中區既有的「老人長照」以及「老故事」為主題，進而與中區的既有組織合作。研究者於社區營造後訪談熱吵民主理事長「青女」得知：

「今年我們就設定要讓『老』的跟『青』的團體能夠看到彼此，小小的合作，打開視野這樣就夠了。今年就這樣，然後作探索，因為每一年不可能做到太多，可是光是這個目標就要花很多力氣。」（受訪者青女）

愛社享和熱吵民主將社區營造目的定為「青銀合創」，愛社享專員「狗狗」於 2017 年透過區公所進入大誠社區關懷據點，並與大誠社區的總幹事建立良好關係，甚至在 2018 年協助大誠社區施作社區營造。研究者訪談中區公所人文課課員艾雅，以及熱吵民主的青女得知狗狗和大誠社區總幹事關係：

「你看總幹事是狗狗一步步帶起來，這是青女輔導時很難做的，我們也不能要求委託廠商做到這樣子。我覺得大誠社區是真的蠻幸運。」（受訪者艾雅）

「大誠這邊常看到狗狗比較少看到我，因為狗狗在他們的定位裡其實是『夥伴』關係，一起提案的人，她並沒有輔導的對價關係。」（受訪者青女）

然而狗狗為愛社享員工，並承辦臺中市社區營造中心，是故不能協助撰寫計畫書，大誠社區必須再找其他人做主導，此時總幹事找到昔日好友「阿兵」協助計畫書寫和核銷，研究者訪談狗狗得知：

「我開始講我的計畫，然後總幹事說：『當然好啊！賀啊！來做啊！』我就跟總幹事說：『你要先上課 12 小時』，他就走掉了！那時候我跟阿兵不熟，我只有跟他見過一次，但他就好像有在聽我講，好像有一點感動，我想說我的目標對象不是你餒！怎麼亂打到你了，阿兵就說：『我來做！』哈哈！」

（受訪者狗狗）

狗狗也引入東海大學城市創生中心行政專員「愛心姐」和「小寶」一同加入，城市創生中心也希望透過這次社造能獲得更多田野資料。愛社享則與熱吵民主相同因為駐點在中區，希望能透過社區營造更扎根中區。聖心修女會和中區樂齡中心則是透過黃區長和青女，在社區營造中與大誠社區發展協會、馬舍公、以及萬春宮等中區傳統宮廟接觸。研究者訪談處理聖心修女會社區營造的專員「紅女」，以及中區樂齡中心主任「王圓圓」得知過去與其他社區組織狀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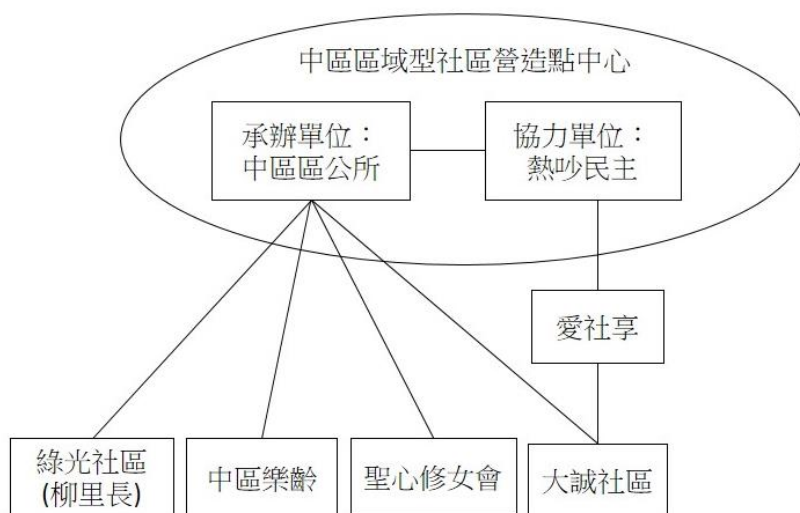
「最主要就是宗教的關係。大家會覺得說妳是不是要來傳教，來關懷據點很奇怪要傳教，所以我聽修女講說一開始真的很不容易，現在這些學員都是修女和志工逐一拜訪。」（受訪者紅妹）

「土地公廟...（冷笑）我們那里里長要辦他不讓我辦，我也沒辦法。我是大誠里的啊！我就不懂為什麼他們不接受我，不懂餒！」（受訪者王圓圓）

兩個組織皆透過「黃區長」與其他社區組織接觸，如中區樂齡中心王圓圓舉辦「唱念中區大小事」，透過區長找來萬春宮住持、馬舍公董事長以及柳里長前

來講述過去中區的歷史故事。聖心修女會除透過黃區長外，也透過過去擔任里長之志工「沈里長」接洽柳里長，在社造中邀請柳里長帶領鄰長來聖心跳舞，並帶關懷據點學員走訪柳川古道和第二市場。此時 2018 年中區區域型社區營造點出現以「中區區公所」為核心的社區組織網絡圖如圖 6-8。

圖 6-8：2018 年臺中市中區區域型社造網絡圖（以中區柳川地區為範圍）



資料來源：本文自行繪製

社區營營造過後，大誠社區部分研究者在社區營造快結案前，關懷據點有位長者在課堂上表示，自己覺得大誠社區改變許多；社造結束後研究者又從東海大學城市創生中心專員「愛心姐」那得知：

「其實就是滿奶奶，她有跟我說社造放入文化訴求...會強迫她們去想他們一生中發生什麼事情。她跟我說現在社區並沒有像她中年時期凝聚力這麼強。她非常懷念那時候...可是這件事情大概在 10、20 年前就消逝了，她其實是很痛心。可是這次社造課程，讓她去回想起這件事情。」（受訪者愛心姐）

在志工方面，好人緣與阿兵經過這次社造，也開始對大誠社區有了願景，我在社造結束後訪談阿兵和好人緣得知：

「我覺得社區最主要是關懷跟照顧，這也是一種簡單的長照，因為長者來你

可以看到他，但他們不來的話，都會有聯絡地址跟電話，就會打電話問啦！
這也可以幫助解決一些問題啦！」（受訪者好人緣）

「就讓它成為不是一個『社區』而已，就是要讓大家知道我們是有在運作的，
我們是有在提升、我們是有在學習...這才是一個社區發展協會做社造...感覺
上是最終目的。」（受訪者阿兵）

在中區樂齡中心和聖心修女會部分，研究者訪談王圓圓、聖心修女會負責社造
施作的專員紅女和珍姐後得知，這些組織在社造後與居民關係開始產生好轉：

「有啊！像那個大墩里里長啊！我有跟他說我有辦什麼活動，要去你們那裏
為你們里民服務，他也說：『好』對啊！還有一個新的當選的，他也都認識
我啊！曝光率有變多！」（受訪者王圓圓）

「如果沒有文化局社造以前，應該就只有成果展吧！那個成果展會邀請社區
居民，可是妳不一定會在這裡上課，學員會叫自己的親朋好友一起來。最主要
還是社造之後大家有變得比較團結，就是有共通的話題。」（受訪者紅妹）

「因為大家有合作過，彼此會了解點，不會只認為聖心只是天主教的機構，
也不會像以前那麼有隔閡。我覺得辦活動完，大家會比較了解我們在幹嘛，
或是對裡面的人比較認識一點...也不能說以前對聖心不和善啦！但真的有
變親切許多。」（受訪者珍姐）

上述資料顯示，聖心修女會和中區樂齡中心都有被居民所排斥經驗，而社造
中它們接受到黃區長協助，因為區公所公部門中間性質，成功串聯起居民與社區
組織，最後這兩個組織再透過社區營造與居民互動。此時本文比較前面社區營造

「一次性關係」的結果，可以發現在新社群「愛社享」和「熱吵民主」的策略中出現不同的結果。參與在中區社區營造點的組織關係有因為社區營造而轉好，研究者在田野結束後，多次在 Line 群組發現王圓圓開始進入馬舍公舉辦活動，原本排斥王圓圓的傳統宮廟也開始接受她，甚至同意王圓圓在宮廟內舉辦活動。

本文回顧新社群，發現新社群策略之所以成功，其中新社群抓住「共同認知」和「共同實作」，必將既有社群合作建立在這兩點當中。本文所指「共同認知」即為楊弘任（2014）之「文化轉譯」概念，新舊社群必須在共同認可的平台上進行施作，如狗狗和青女鎖定老故事和老人長」作為社區營造施作方針，此正好符合舊社群正在進行的社區關懷據點和懷舊情節。「共同實作」則為「情感陪伴」概念，新舊社群在同平台上相互陪伴，進而產生情感交流。是故本文認為單以「文化轉譯」不能完全解釋新舊社群交融與合作，社區營造雖然是資本相互投資與競爭的場域，然「社區」則是因為網絡成員因為共同利益和共同情感連結，是故以日本漢字「絆（きずな，Kizuna）」來詮釋社造中因為「共同認知」和「共同實作」所產生的情感連結。

日本漢字「絆」不同於中文的用法，日文的「絆」意指「厚重的友情」，有著情感聯繫，牽掛思念之意。「絆」於 2011 年獲選為日本代表漢字，當年日本 311 大地震發生時，代表災後團結與振作之意。然在日本整體社會中，該漢字又代表日本從「冷淡與疏離」走向「互助與互惠」的社會（uedada, 2012）。「絆」在中區柳川地區社區發展脈絡中如同日本 311 地震後人際關係情感變化，從舊有的「社區派系衝突」逐漸走向「新舊社群交融」新社會。社造中出現的「絆」於「香油錢關係」相較，雖然都具有模糊彼此差異功能，使彼此情感連結形成黏著性社會資本的功能。然「絆」的出現是因為新舊社群間「共同實作」所產生的情感連結，彼此間情感是建立在水平的人際關係互動當中。「絆」的出現也說明柳川地區開始接受新社群的加入，使社群間出現「多元」共存的意涵，「絆」同時具有「橋接式社會資本」的功能，新社群持續帶入新成員和舊社群互動。是故本文認為雖然新舊社群合作中，仍存在由上而下決策的組織文化，但在新社群介入下，彼此

的關係正逐漸走向多元且水平的關係。社造中「絆」建立於相異社群「共同認知」和「共同實作」，如同 Putnam（1993）所強調市民社會必須建立在「市民參與」和「多元且密集的社區網絡」。

柒、分析與結論：

本文主要透過田野研究，說明如何擾動舊有社區派系網絡，改變資源提供方式以及建立新關係。在派系定義上本文採用陳明通（1995）和蔡明慧（1998）「衝突」的單位與「交換」的特性，是故由香油錢關係組成的「舊政治」運作規則來自於網絡成原彼此資本的交換，在選舉期間透過衝突來區分彼此。2018 年社區營造後出現的「新政治」相較於前者則具有「互助」的性質，資本供給上新政治透過「社區營造」處造投資場域，新舊社群抱持各自目的進入社區營造，然彼此之間無法憑一己之力完成社造，促使新舊社群在社造中開始合作，進而找到「共同認知」的平台，並「共同實作」創造彼此間羈絆，新政治所出現的「絆」逐漸取代舊政治「香油錢關係」，本文於以下做個田野資料整理，並與各理論進行對話，最後提出政策建議。

一、都市中的社區派系發展：

臺灣在 2000 年後地方派系研究將金融制度自由化（王輝煌、黃懷德，2001）、都市化和民主化（高永光，2001；趙永茂，2001；黃信達，2016）視為地方派系逐漸式微的主要原因，其中王金壽（2004）更在屏東個案中認為地方派系已經瓦解。本文個案臺中市研究中，2000 年初曾國鈞（2001）認為臺中市屯區快速都市化，導致地方派系選舉動員結構快速改變，張派和賴派難以再透過派系網絡進行選舉動員。然本文在中區柳川地區的社區和鄰里當中，卻發現過派系網絡和政黨組織正透過宗教組織發展。

中區里務經濟供給依靠「宮廟」或「宗教組織」進行供給，在張派缺乏信用合作社等經濟供給（王士胤，2017），規模上已不如以前「縣市」層級，然在「鄰里」和「社區」層級的派系網絡依然存在。派系透過擔任市議員和政黨合作，掌握村里長和宮廟所沒有的「社會資本」，進而與之交換來鞏固自身政治支持。最

後派系和鄰里、宮廟之間再透過結拜、人情債和擔任榮譽職等方式，以「倫理道德」來模糊彼此主從關係，甚至約束彼此行為。此為種被「模糊的侍從關係」為本文所指舊政治特性，且因為潛藏在宗教組織當中而稱為「香油錢關係」。

此時本文引用張茂桂、陳俊傑（1986）之見解，都市化中等地區具備足夠的利益基礎，且具有傳統社會關係，派系競爭在此最為發達。然當時張茂桂認為鋼結論仍缺乏證據，但本文再中區發現，中區為最早臺中市商業開發地區，因而在屯區迅速都市化期間，中區人口迅速下降，留下傳統宮廟以及小店家、商圈經濟成為派系政治發展條件。

然而本文認為香油錢關係建立在社會資本上下不對等情形，資源流動仍然透過政黨、派系到地方鄰里長或宮廟主委，從中央政府到鄰里由上而下流動，此種關係仍然保有權力金字塔結構（丁仁方，1999）。香油錢關係僅消弭「政治權力」上的主從關係矛盾，中區舊政治仍保有相異社群上的衝突。是故看似香油錢關係處理許多社會福利上問題，但仍不具備市民社會意涵。

二、「一次性關係」和「絆」：

柳里長參與都發局和文化局社區營造中，她將資源動員用於社區參與當中，柳里長僅需要確保「有人施作」，社區營造即可完成。研究者實際參與後也發現，區輔師和艾雅雖認為社區參與是社區營造的核心價值，然在社區營造即將結案之時，區輔師會用盡所能尋找社區專家協助結案，是故柳里長抓住此精隨動員鄰長，即便社造行動是以柳里長意志進行，社區營造只要結案便能「兌現」各方利益。

前述「典範移轉」是柳里長和輔導單位相互兌現結果，而在施作者間本文發現彼此為兌現利益相互容忍情形。柳里長和招弟在社造中相互忍耐，兌現利益後立即解散。雖然彼此有意願進行下次社造，然沒有繼續合作意願，106 年度都發局社造後招弟和柳里長並沒有實質合作狀況，甚至出現土地利用上衝突。此時的「一次性關係」是成員在社造中無法預料下，相互行動所產生的結果。又研究者抓住派系政治「利益交換」性質參與文化局社造，看似公開分工的寫生活動，最後仍被居民視為里長選前利益交換；社區報發行也由柳里長主導，以柳里長為核

心的動員運作模式再次複製到文化局社造中，然這次僅有柳里長得利，但也流失社區營造施作人員，柳川里鄰里組織又因為一次性社區營造後彼此關係再次瓦解。

然在新社群部分，愛射向和熱吵民主與既有社群在「共同認知」基礎上劑型社區營造合作，「共同認知」即為楊弘任所指之文化轉譯，然不同在於楊弘任(2014)林邊鄉案例，彼此透過實作相互理解對方價值，中區柳川地區的共同認知是在社區營造前新社群的策略。老人長照和老故事同樣受到大誠社區、聖心修女會以及中區樂齡中心認同，新舊社群雖抱持不同目的進入社區營造，然彼此在相同認知的方向執行社區營造。「共同實作」則不同於楊弘任林邊鄉案例的「實作」意涵，本文所指共同實作指「情感陪伴」。新舊社群在社造中找到共同施作方向，並在社造中相互陪伴和解決問題，社造結束後新舊社群所建立的濃厚關係。

上述兩種特性導致社造中新舊社群出現濃厚的情感，不同於柳里長進行社造施作案例，舊政治的「動員」並未成功移入社區營造，反而為因舊社群在社造中所建立的「絆」轉移至「舊政治」當中，大誠社區關懷據點長者社造後產生社區意識，聖心修女會和王圓圓也因此與宮廟組織開始合作，施作者如狗狗、紅妹、阿兵和愛心姐皆度社區產生想法。本文從以第三章所提及「階層位階」和「網絡位階」進行變項比較如表 6-2-1：

表 6-2-1：「絆」與「香油錢關係」功能比較表

關係名稱	階層位階	網絡位置	功能
香油錢關係	上下不對等	中區宮廟和鄰里長相異網絡	消弭主從關係
絆	水平關係	中區宮廟、鄰里長、既有組織和新社群異質性網絡	消弭社群異質性

資料來源：本文依照田野日記自行整理

本文發現「香油錢關係」和「絆」在網絡位置上皆處於「異質」，如王圓圓和聖心修女會在社區營造前很少跟宮廟和鄰里長接觸，甚至社群團體差異比舊政治還大，如外縣市成員至中區成立新團體，愛社享與熱吵民主皆非中區居民所組成。然「絆」在階層位階上屬水平關係，新舊成員因為互動相認識和陪伴，是故

本文社區營造在新舊社群相同認知上施作，然其中的情感陪伴才使數個具有差異的社群相互連結進而發生「絆」。絆比起香油錢關係同樣達到「消弭差異」的功能，絆係發生在水平的合作關係上，新舊社群僅需消弭網絡位置之衝突即可，不須再消弭階層位階的矛盾，此時絆得以取代舊政治「香油錢關係」連結，達到完全消弭衝突的功能。

此時本文將「一次性關係」和「絆」做比較，以「組織」為單位，本文所提到的四個變項「共同認知」、「共同實作」、「利益兌現」、以及「社造意願」，透訪談個組織整理出表 7-1 和 7-2：

表 7-1：都發局社造變項對比表

組織	姓名	組織職位	共同實作	共同認知	利益兌現	社造意願	結果
柳川里鄰里組織	柳里長	里長	X	X	O	O	一次性關係
	花媽	社造策畫	X	X	X	X	
	許先生	志工	O	X	X	已逝	
	水工阿姨	志工	O	X	X	X	
	牛肉哥	志工	X	X	X	X	
	娟媽	志工	O	X	X	X	
	李媽	志工	X	X	X	X	
	琴媽	社區幹部	X	X	X	X	
	研究者	志工	O	X	X	X	
東海學生(藝術家)	招弟	藝術家	X	X	O	O	
區輔師團隊	山谷百合	區輔師	輔導	X	X	O	
	獻哥	區輔師	輔導	X	X	O	

資料來源：本文自行整理繪製

表 7-2：文化局變項對比表

組織	姓名	組織 職位	共同 實作	共同 認知	利益 兌現	社造 意願	結果
柳川里鄰 里組織	柳里長	里長	X	X	O	O	一次性 關係
	花媽	社造 策畫	O	X	X	X	
	研究者	社造 策畫	O	X	X	X	
	牛肉哥	志工	X	X	O	O	
	好人緣	志工	O	X	X	O	
	娟媽	志工	O	X	X	X	
	水工 阿姨	志工	O	X	X	X	
大誠社區	總幹事	總幹事	O	O	O	O	絆
	理事長	理事長	X	O	O	O	
	阿兵	社造 策畫	O	O	O	O	
東海城市 創生中心	愛心姐	志工	O	O	O	O	
	小寶	志工	O	O	O	O	
愛社享	狗狗	社造 策畫	O	O	O	O	
熱吵民主	青女	輔導員	O	O	O	O	
區公所	黃區長	區長	O	O	O	O	
	艾雅	輔導員	O	O	O	O	
聖心修會	白修女	修會 負責人	O	O	O	O	
	紅妹	專員	O	O	O	O	
	珍姐	專員	O	X	O	X	
	小蔡	志工	O	X	X	X	
中區樂齡	王圓圓	主任	O	O	O	O	

資料來源：本文自行整理繪

在表 7-1 可以發現，各角色的「利益兌現」僅會影響下次社造施作的意願，甚至在表 7-2 更出現如牛肉哥和好人員此種無利益兌現，但有社造意願的狀況，各角色利益有無兌現對於最後的結果並無太大影響。然在「共同實作」與「共同

認知」兩個變項上，結果若出現「一次性關係」，各角色彼此間一定缺乏「共同認知」或「共同實作」，大誠社區理事長雖沒有一同參與，然理事長已經權力下放給總幹事處理，是故總幹事在此如同理事長的角色。是故要讓社區營造中出現「絆」，則必須讓所有成員在「共同認知」的平台上施作，且彼此必須「共同實作」達到情感上陪伴，方得產生彼此之間的「絆」。

社區營造中「一次性關係」的出現無法讓社區營造永久存續，甚至讓成員彼此對兌現到利益後分崩離析，唯有「絆」的出現才能擾動舊有關係，甚至讓社區營造持續下去。最後本文回顧市民社會討論，何明修（2007）和熊瑞梅（2014）接認為臺灣在解嚴後市民團體雨落春筍般出現，然臺灣因為過去威權政府留下的文化，使得普遍民眾公共參與能力低落，即使結社也難以散播公民美德。而丁仁傑（1999；2007）則以「個人動機」來判斷，市民組織行動是否為市民社會的意涵。然而本文中「一次性關係」和「絆」的出現都是「結果面相」，亦即新舊社群「絆」的建立並非彼此參與社區營造的目的。是故本文在理論上質疑以「成員動機」論斷市民社會的可行性，「絆」和「一次性關係」的出現是結果面項，甚至是成員在社區營造前「無法預期的結果」。

三、偶然促成的「絆」：

中區柳川地區的「絆」的產生除社區營造經費供給，另有如熱吵民主和愛社享等社區營造組織。它們在社造前已有事先調查中當地政治生態，以此為基礎進行策畫。然新社群在執行計畫同時，無法預知下年度該經費能否穩定提供，甚至現有社區營造經費是不足以養活一個專員，研究者社造後訪談青女得知：

「其實今年的區域型社造中心..整個計畫是養不起一個人的，一個全職是養不起的，所以他只能被看作是兼職的工作。那也是為什麼你會看到這個計畫幾乎...我們整個團隊只有我一個人再跑…」（受訪者青女）

又在區公所部分，雖然黃區長要求公所各課室「走出去」，然此種改革增加公所

成員業務量。2019 年臺中市市長為國民黨籍後，黃區長在被調換前夕，研究者訪談黃區長得知區公所甚至市政府公務員不喜歡中區社區組織發展：

「早上還開會啊！有一些民政課的長官也認為說...像昨天呂老師帶大家去參訪，我是說我們的環保志工呂老師要廣為宣傳，居然上面的課長還講說不要，要低調一點...要低調嗎？有做就好幹嘛還這樣？他們不相信就算拉對不對！」（受訪者黃區長）

本文依照前述社區營造狀況，市政府、區公所和社區組織在事前完全沒有任何溝通，社區營造成為砸錢便期待社區有轉變，卻出現如柳里長將舊政治派系動員移轉至社區營造狀況；新社群為達到目的相忍與舊社群合作，最後達到目的後便拋棄關係。107 年度中區區域型社區營造所出現的新舊社群「絆」，是在市政府投入資本創造社區營造場域後，幸運遇上愛社享和熱吵民主團隊，新社群利用少許的資源與舊社群組織合作社區營造，是故本文認為「社區營造」和「絆」偶然相遇，促成中區柳川地區的「新政治」並取代舊政治。

本文認為若地方政府想再依賴此種「不可預期」的結果，除容易增生更多一次性關係的失敗社區營造外，政策資源供應也可能因為政黨再次輪替，新市府的方向有所不同導致資源挹注減少，依靠社區營造的新社群更難在社區當中生存，中區柳川地區剛浮現的市民社會網絡可能再次瓦解。

四、結論和政策建議：

新政治是新舊團體相容後所促成，然所有社區營造成員皆抱持不同動機與與達成利益，在社區營造中進行資本投資與兌現，是故新政治是新舊團體偶然促成的結果，本文以此回顧問題意識提出本文理論上和實踐上意義結論：

（一） 臺灣地方派系與鄰里層級關係：

過去臺灣地方派系研究認為，都市化導致人口結構快速改變，破壞地方派系傳統選舉動員網絡，進而促使地方派系式微（高永光，2001）。王金壽（2004）

發現到屏東都市化較高地區，地方派系瓦解速度相對較快。然本文案例中，以「鄰里」和「社區」為單位地區派系仍存在，甚至在已都市化地區蓬勃發展。中區柳川地區派系政治依靠過去存留下來的宗教與小店家關係，於宗教信仰底下繼續生存，且仰賴宗教信仰為中介發放資源，藉此「藏匿」與鄰里日常生活當中。

本文認為「都市化導致派系式微」理論根本上沒有錯誤，僅缺乏鄰里範圍分析與討論。如臺中市總人口數成長，卻有「中區」此行政區總人口數不斷遞減的行政區。中區柳川地區因為人口數下降，且保有傳統宗教文化，促使派系政治在此存活並蓬勃發展。

（二）從「結果」論斷市民社會：

另外在市民社會研究上，丁仁傑（1999；2007）以行動者動機論斷市民社會發展，何明修（2007）直接認斷臺灣仍受到威權社會影響，雖臺灣市民組織眾多，然民眾參與普遍低落，熊瑞梅（2014）甚至認為傳統宮廟和社區營造組織本身不具有市民社會性質。

本文在中區柳川里案例中發現，前述在以「組織性質」和「行動者動機」認斷市民社會性質仍有瑕疵之處。本文案例新政治的出現是新舊社群行動前「不可預期」的結果，新舊社群參與社造動機皆是「為自己」而為，然自過程中找到相互可以認知的平台，必且在社區營造中相互陪伴，最後產生出「絆」。而社區營造制度在本文如同賭博般，投入資本期待有良好的行動者進行擾動，然在案例中僅有愛社享和熱吵民主策略成功，研究者策略失敗，甚至出現具有投機性質的東海藝術家招弟團隊，完全沒有與地方居民建立情感之動機。是故本文認為中區柳川地區出現的「新政治」是社區營造中「不可預期的結果」，若從社區營造成員動機出發，則難以觀察市民社會意涵。然而本文也認為，目前社區營造制度仍保持此種賭注性質，中區柳川地區市民社會會再次瓦解，社區營造無法長久存活。

（三）由制度創造「絆」：

本文認為臺灣社區營造在制度設計上，需先克服「跨局處社區營造整合問題」（Yi-Yi Chen & Yeun-Wen Ku, 2017）。如臺中市都市發展局和文化局社區營造屬

於不同運作系統，輔導單位並未整合，甚至區公所角色責任也不盡相同。本文依照以上論點提出以下三點政策建議：

1. 臺灣社區營造於政府層次需克服「跨部門或局處」整合問題：

社區營造中如都市發展局和文化局在社區營造中雖有「軟硬體」之分，使得社區工作實務上社區會交叉「挪用」資源，大誠社區也出現利用「衛福部」社區營造資源進行社會局社區關懷據點營運情形。然社區營造實務上卻仍存有「資源不足」問題，本文認為此為從中央到地方各部門社區營造重疊浪費導致，雖各政府各部門各有專長與任務，然社區營造屬於「跨領域」工程，仍需各部門多方協調與合作完成，「跨領域」整合為臺灣社區營造首要解決問題。

2. 區公所中介角色：

社區營造目前雖仰賴公私部門合作，然在社區營造實務上仍出現既有社區營造組織或鄰長「排擠」外來組織，此問題可能發生外來團隊無法將專業術語進行轉譯，進而無法融入社區當中（劉立偉，2008）。在本文個案田野研究中，聖心修女會和王圓圓也曾是被排擠對象。然在區公所協助下，中區柳川地區的既有社群甚至新社群皆融入社區當中，本文個案中新舊社群成功融合仰賴於區公所過去「區里行政」基礎。是故本文認為社區營造除考慮「公私合作」外，區公所本身仍扮演重要中介角色，如何落實「社造行政化」則為未來社區營造重點，市政府在社區營造中也必須協調各區公所內，「各課室」執行工作態度，以免將執行區公所接觸社區組織視為負擔。

3. 建立社區營造策略小組：

中區柳川地區「新政治」的出現為「偶然」的政策和新舊團體合作下所促成，現今社區營造仍為中央到地方政府投入資源，便期待社區組織自行組織和運作的「賭注型」社區營造。若要解決此問題，地方政府需與既有社區組織進行討論，甚至與大專院校合作研究鄰里和社區層級政治文化，讓「賭注型」社區營造轉變為具有策略規劃性質的運作模式。

捌：參考資料：

Aristotle (1981). *The Politics*. T. A. Sinclair (Trans). N.Y. , Penguin Books Press.

Adam Smith (2002).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Knud Haakonssen (ed). U.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dam Ferguson (1793). *An Essay on the History of civil Society*. 6th (ed). London ,
printed for T. Cadell; and W. Creech, and Bell and Bradfute, at Edinburgh.

Bourdieu, Pierre (1984). *Distinction-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Richard Nice Tran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Bourdieu, Pierre (1986). The forms of capital. In Richardson (ed), J.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pp. 241–258). New York ,
Greenwood Press.

Barnes, J. A. (1954). Class and Committees in a Norwegian Island Parish. *Human
Relations* 7, 39-58.

Bott, Elizabet (1957). *Family and Social Network: Roles, Norms, and External
Relationships in Ordinary Urban Families*. 2nd (ed). London, Routledge.

Burt, Ronald S. (1992). *Structural holes :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competi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stells, Manue (1977). *The urban question : a Marxist approach*. London, Edward
Arnold.

Castells, Manue (1983). *The city and the grassroots : a cross-cultural theory of urban
social movement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oleman, James Samuel (1988). “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 95-120.

Desmond, Matthew (2012). Disposable ties and the urban poor.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7 (5), 1295-1335.

Firth, Raymond (1957). Factions in Indian and Overseas Indian Societies, Part 1:

- Introduction.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8 (4), 291-295.
- Fukuyama (1995). Social Capital and the Global Economy. *Foreign Affairs* 74, 89-103.
- Fukuyama (2001). Social Capital and Civil Society. *Third World Quarterly* 22 (1), 7-20.
- Granovetter (1973).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8 (6), 1360-1380.
- Jacobs, J. Bruce (1979). "A Preliminary Model of Particularistic Ties in Chinese Political Alliances: Kan-ch'ing and Kuan-hsi in a Rural Taiwanese Township. *The China Quarterly* 78, 237-273.
- Mbaye, Lo (2007). Conceptualizing Civil Society in Africa: Eavesdropping on Civil Society Associations in Senegal, In <http://dspace.iua.edu.sd/handle/123456789/2865>.
- Marsden (2000). Social Networks. Borgatta, Edgar F and Montgomery, Rhonda J. V. (ed.) *Encyclopedia of Sociology*, 2727-2735. Detroit , Macmillan Reference.
- Nan Lin. (1999). Building a Network Theory of Social Capital. *Connections* 22 (1), 28-51.
- Putnam, Robert D. (1993). *Making democracy work :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Putnam, Robert D. (1995). Bowling Alone: America's Declining Social Capital. *Journal of Democracy* 6 (1), 65-78.
- Putnam, Robert D. (2000), *Bowling alone :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 , Simon & Schuster.
- Simmel, Georg (1950). The Metropolis and Mental Life. D. Weinstein. Trans. Kurt Wolff (ed.). *The Sociology of Georg Simmel*: 409-24 . Glencoe, Free Press.
- Teh-chang Lin. (2005). *An Assessment of Civil Society in Taiwan (2005)* -

- Transforming State-Society Relations: The Challenge, Dilemma and Prospect of Civil Society in Taiwan*. Retrieved from CIVICUS: World Alliance for Citizen Participation. website: http://www.civicus.org/media/CSI_Taiwan_Report.pdf.
- Tönnies, Ferdinand (2001). *Community and civil society*. Cambridge ;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irth, Louis (1938). 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44 (1), 1-24.
- 秦修明、湯新楣、李宜培譯（2000）。民主在美國（Alexis de Tocqueville 原著）。臺北：貓頭鷹。
- 馬洁宇譯（2017）。托克維爾：自由的貴族源泉（Lucien Janme 原著）。廣西桂林市：灕江出版社。
- 吳芝儀，廖梅花譯（2001）。質性研究入門：紮根理論研究方法（Anselm Strauss & Juliet Corbin 原著）。雲林：濤石。
- 林祐聖、葉欣怡譯（2005）。社會資本（Nan Lin 原著）。臺北：弘智文化。
- 鈕文英（2018）。質性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二版）。臺北：雙葉書廊。
- 楊弘任（2014）。社區如何動起來？：黑珍珠之鄉的派系、在地師傅與社區總體營造（增訂版）。新北市：群學。
- 東京碎片（uedada）（2012）。絆：後 311，日本社會關鍵詞。臺北：貓頭鷹。
- 項飆（2000）。跨越邊界的社區：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
- 蔡明惠（1998）。臺灣鄉鎮派系與政治變遷：河口鎮「山頂」與「街仔」的爭鬥。臺北市：洪葉文化。
- 王振寰（1996）。誰統治臺灣？轉型中的國家機器與權力結構。臺北：巨流。
- 陳明通（1995）。派系政治與臺灣政治變遷。臺北市：月旦。
- 費孝通（1991）。鄉土重建、鄉土中國。上海市：上海書店。
- 廖忠俊（1997）。台灣地方派系的形成發展與質變。臺北：允晨文化。

- 黃秀政（2008）。**臺中市志-沿革志**。臺中市：臺中市政府出版。
- 黃秀政（2008）。**臺中市志-經濟志**。臺中市：臺中市政府出版。
- 黃秀政（2008）。**臺中市志-地理志**。臺中市：臺中市政府出版。
- 黃信達（2016）。地方派系政治與地方生態的審思與展望。載於王業立（編）**臺灣民主之反思與前瞻**（345-374 頁）。臺北：臺灣民主基金會。
- 蔡禾、賈文娟（2011）。逆差序格局：關係降低誰的成本。載於邊燕杰（編），**關係社會學：理論與研究**（53-70 頁）。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熊瑞梅（2014）。〈團體與組織〉。載於王振寰、瞿海源（編），**社會學與臺灣社會**（第四版）（51-88 頁）。高雄：巨流。
- 陳介玄（1994）。派系網絡、樁腳網絡及俗民網絡—論台灣地方派系形成之社會意義。載於東海大學東亞社會經濟研究中心（編），**地方社會**（31-67 頁）。台北：聯經。
- 張茂桂、陳俊傑（1986）。現代化、地方派系與地方選舉投票率之關係：自由派理論的再檢討。載於中國政治學會（編），**投票行為與選舉文化研討會論文集**（487-519 頁）。臺北：中國政治學會。
- 黃子倫（2018）。建構臺中城市主體性：城市運動的懷舊現代性與社群想像。**文化研究季刊**，163，3-29。
- 蔡育軒、陳怡君、王業立（2016）。縣市合併後地方議會次級團體之運作：以臺中市議會為例（2010-2014）。**政治科學論叢**，67，51-90。
- 呂建德（2016）。邁向活躍老化—台中市托老一條龍計畫。**新世紀智庫論壇**，76，18-24。
- 王文誠（2011）。反身性的社區營造：實踐性的地理學想像。**都市與計劃**，38（1），1-29。
- 劉立偉（2008）。社區營造的反思：城鄉差異的考量、都市發展的觀點、以及由下而上的理念探討。**都市與計劃**，35（4），313-338。
- 丁仁傑（2007）。市民社會的浮現或是傳統民間社會的再生產？-以台灣佛教新

- 慈濟功德會的社會實踐模式為焦點。**臺灣社會學刊**，38，1-55。
- 丁仁傑（1999）。文化脈絡中的積功德行為：以臺灣佛教慈濟功德會的參與者為例，兼論助人行為的跨文化研究。**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85，113-177。
- 何明修（2007）。公民社會的限制－台灣環境政治中的結社藝術。**臺灣民主季**，4（2），33-65。
- 吳介民、李丁讚（2005）。傳遞共通感受：林合社區公共領域修辭模式的分析。**台灣社會學**，9：119-163。
- 王金壽（2004）。瓦解中的地方派系：以屏東為例。**台灣社會學**，7，177-207。
- 趙永茂（2001）。新政黨政治形勢對台灣地方派系政治的衝擊。**政治科學論叢**，14，153-182。
- 高永光（2001）。「城鄉差距」與「地方派系影響力」之研究－1998年台北縣縣議員與鄉鎮市長選舉的個案分析。**選舉研究**，7（1），53-85。
- 蔡英文（1993）。公民德性，市民社會與主權國家 現代市民社會論述之探討。**政治科學論叢**，10：83-112。
- 王士胤（2017）。臺灣地方派系衰退的政治經濟分析：以臺中市張派為例。國立成功大學政治經濟研究所碩士論文。
- 蘇庭玉（2014）。人民的城市翻轉力—以臺中市區為例。中原大學室內設計研究所碩士論文。
- 黃琬琇（2013）。從公私協力夥伴關係探討臺中市區發展。國立中興大學國家政策與公共事務研究所碩士論文。
- 向雯涵（2009）。臺中市區都市再生之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施怡真（2002）。臺中市都市周邊重劃擴張與舊市區更新間關係之探討。逢甲大學土地管理學系碩士論文。
- 曾國鈞（2001）。地方政治生態與市地重劃關係之研究：以臺中市為例。東海大

學公共事務碩士學程在職進修專班。

鄭吉成（2001）。臺中市百貨公司時空發展歷程之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吳芳明（1996）。地方派系的分化與結盟變遷之研究—以嘉義縣和高雄縣為例。國立中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

張展誌、朱淑君、林柏燕（2017年9月13日）。湊滿百條命才啟航！衛爾康大火 64 亡幽靈船現蹤奪命。三立新聞網，2017 年 9 月 13 日。取自：
<http://travel.setn.com/News/294329>。

吳昱賢（2016）。觀點投書：中區再生基地出了什麼問題？。取自
<https://www.storm.mg/article/145650>。

盧思岳（2017）。從自己動手做到培訓輔導社區做 --台中市如何引導區公所參與社區營造？（下篇）。取自：<https://communitytaiwan.moc.gov.tw>。

內政部（2014）。城鎮風貌型塑整體計畫（102 至 105 年）。取自：
<https://www.cpami.gov.tw/kids/filesys/file/chinese/dept/up/up102-105.pdf>。

臺中市區公所（2018）。歷史沿革。取自：
<http://www.central.taichung.gov.tw/ct.asp?xItem=63952&ctNode=26205&mp=128010>。